

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的政策選擇分析：以美國對「日本崛起」與「中國崛起」之回應為例

陳亮智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兼代所長

劉兆隆*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專任副教授

摘要

本文認為，「既有強權美國 vs. 崛起強權日本」（1931~1941）與「既有強權美國 vs. 崛起強權中國」（1993~2018）的比較，能為現今的美中關係提供許多建設性的思考。本文從既有強權的角度觀察其如何回應崛起強權；以Randall Schweller的歸納為基礎而建立一個相對完整的政策選擇全貌。作者發現：面對1931~1941年崛起的日本，美國先採「中立、綏靖」，後改採「制衡」，最終採「戰爭」。面對1993~2018年崛起的中國，美國以「交往」為基調而佐以「戰略夥伴關係」，然因中國崛起與美國重返亞洲，其逐漸轉成「既交往又制衡」，是典型的「混合策略」。如此，成就兩個不同的大國互動結果。

關鍵詞：美日關係、美中關係、制衡、交往

* 通訊作者

壹、前言

隨著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與軍事現代化，「中國崛起」及其所衍生的大國政治問題已成為當代國際關係研究裡的「顯學」。若干研究文獻即試圖從過往的歷史經驗中，尋找解釋大國興衰（rise and fall）的原因，並試圖在其中理解既有強權（dominant power）與崛起強權（rising power）的互動形態，包括他們的行為模式，以及可能對現在與未來國際秩序造成什麼影響（Kennedy 1987; Modelski 1987; Doran 1991; Rasler and Thompson 1994）。而有關強權崛起與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是來自於他們之間不同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速度，以及在此情況下所衍生的「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現象（Kennedy 1987, xv; Kugler and Organski 1989; Tammen, Kugler, Lemke, Stam III, Abdollahian, Alsharabati, Efrid, and Organski 2000; Lemke 2004; 吳玉山 2011, 389-415）。尤其是當崛起強權的力量迅速地追趕上既有強權，並且對其造成威脅，甚至可能取而代之，則國際秩序將出現急遽的動盪與變化，而一場既有強權與崛起強權之間的戰爭勢必不可避免。有關此一歷史必然，Graham Allison 稱之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Gilpin 1981, 187-188; Allison 2017, xiv-xvi）。在此脈絡下，許多討論美中關係的問題可化約為以下幾個面向：第一、在既有強權美國與崛起強權中國的互動當中，未來國際體系會呈現怎樣的面貌？第二、中國的真正的戰略企圖為何？是安於現狀？或是一位修正主義者？第三、美國從1972年所施行的中國政策是否依然有效？有無必要調整？若是，又該做怎樣的改變？

就第一個問題來說，若干對美國霸權抱持樂觀的見解即認為，美國強大的國力及其所建立的國際建制與秩序，是不易為中國所取代（Ikenberry 2008, 23-37; Beckley 2011, 41-78; Christensen 2015, 63-94）。然而也有許多看法是傾向於悲觀的，因為處於權力轉移的關係，美中衝突是必然的；美國獨霸的單極體系將會很快地走進歷史（Layne 1993, 5-51; Monteiro 2011, 9-40; Schweller and Pu 2011, 41-72）。就第二個問題而言，若干文獻指出，北京雖是在崛起之中，但它並還不是真正的修正主義者（Johnston 2003, 5-56; Feng 2009, 313-334; Zhao 2016, 13-21）。但隨著實力的增強，北京已明顯地呈現出它在國

際事務上的「武斷性」(assertiveness)，其修正主義者的面貌也越見清晰 (Schweller and Pu 2011, 41-72; Johnston 2013, 7-48; Wright 2015)。有關第三個問題，部分文獻認為，美國非但要延續其既有的對中交往政策，並且應該更加強與深化 (Ikenberry 2008, 23-37; Brooks, Ikenberry, and Wohlforth 2012, 7-51)。然而，亦有學者指出，爲了因應實力日漸壯大的北京，華盛頓應在交往政策中強化「制衡」，甚至是「圍堵」的元素 (Tellis 2013; Mearsheimer 2014)。然而，卻也有研究顯示，美國應逐漸地退出東亞，改採「離岸平衡」策略以維繫美國的領導與利益 (Gholz, Press, and Sapolsky 1997, 5-8; Layne 2006a, 159-192)。

究竟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比較可爲現今的美中關係帶來什麼功課 (lessons) 與啓發 (enlightenments)？事實上，本文之主題—「既有強權美國 vs. 崛起強權日本」(1931~1941) 與「既有強權美國 vs. 崛起強權中國」(1993~2018) 的對照與比較具有以下幾項意義：¹ 第一、兩個組合的既有強權都是美國，此一比較研究有助於認識美國是如何與東亞前後兩個崛起強權互動。固然，兩個組合的時間差距約有70年之久，時空環境與國際體系亦有所不同，例如：1931~1941年的東亞是一個多極國際體系，主要列強有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與蘇聯等；而1993~2018年的東亞則是一個單極霸權國際體系，但卻有朝向由美、中兩國所組成之權力平衡的趨勢 (Ikenberry 2014, 41-63)。但不論如何，對既有強權美國而言，其爲維繫它在西太平洋的優勢與利益是一致的。在1931~1941年期間，美國對中國（乃至遠東及亞洲）的立場是保持「門戶開放」(Open Door)，各國皆可在此進行通商，而不希望看到單一系列稱霸並壟斷此區域的資源與利益，對日本亦是如此 (Green 2017, 539)。在1993~2018年期間，美國對中國的立場是歡迎中國崛起，但希望中國的強大是融入開放且既已建立的國際秩序，而非導入一個封閉且非自由

¹ 有關本文的時間設定，在「美日關係」部分，由於1931年發生滿州事變，自此日本勢力進入中國東北，而美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8年）後，取代英國而成爲世界霸權，因此選定從1931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在「美中關係」部分，1993年爲Bill Clinton總統的第一任總統任期開始，而整個1990年代恰爲北京在經濟與軍事上開始蓬勃發展的階段，因此選定1993年爲觀察的起點。

的國際體系 (Ikenberry 2014, 48-51)。第二、雖然兩個組合的東亞崛起強權 (日本與中國) 的崛起方式與策略選擇有所差異 (O'Neil 2003a, 3-4)，但他們崛起的結果皆衝擊了既有強權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與地位。日本崛起衝擊了美國對中國 (遠東與亞洲) 的「門戶開放」主張，其稱霸遠東也威脅了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利益；現代中國崛起則挑戰了美國在亞洲與世界的領導地位。也因此美國必須做出「相對應」的作為以維護它的國家利益。換言之，由於東京與北京的不同崛起策略，適足以提供我們觀察華盛頓之所以採取相對應的政策選擇。第三、本文的分析方式乃跳脫歷史學與外交史的傳統研究途徑 (重於史實的敘述與分析)，而採取先行建立一個相對完整的分析架構，再依循「外交軍事」與「國際經濟」兩個面向，比較日本與中國的崛起作為，以及美國採取的回應策略。因此，本文嘗試結合「國際關係之分析架構的建立」與「歷史學或外交史的素材」，一方面可用於檢視過往的歷史案例，另一方面亦可用於分析當今的大國關係，進而展望一個更好的當代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

準此，本文發展如下：首先，根據Randall Schweller的歸納，介紹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可以採行的七種政策選擇，並補充其他選擇。準此，本文嘗試建立一個相對完整的「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之政策選擇的概觀光譜」；依此，我們可以觀察「美國對日本」(1931~1941)與「美國對中國」(1993~2018)所採取之政策的位置。其次，依權力轉移概念，分別在兩個時空當中(1931~1941與1993~2018)，對照並比較「美日」及「美中」兩個組合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再者，沿著外交軍事與國際經濟兩面向，比較崛起日本與崛起中國的作為，以及既有強權美國對他們所採取的回應。最後，本文歸結：1931~1941年日本比1993~2018年中國在外交與軍事上是更為激進；向外軍事侵略及偷襲珍珠港的後果，迫使美向日宣戰。另外，1931~1941年日本不若1993~2018年中國在國際經濟上具有豐沛的力量，並輔以總體性經濟戰略。訪古思今，當今的美中關係應可以1931~1941年美日關係為鑑；訪今思古，則現今的美中關係亦可為1931~1941年美日關係之師。

貳、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的政策選擇：一個概觀（An Overview）

根據邏輯演繹，崛起強權對既有強權的態度可以有三種類型：(1)挑戰並改變既有強權的領導地位，及由它所主導的國際政經秩序；(2)不挑戰、不改變前述的事項；(3)暫不挑戰、不改變既有強權，待他日實力更堅強時再伺機行動。相對地，既有強權面對新興強權時也可以有三種選擇：(1)友善地歡迎與接納（將此視為「機會」）；(2)不友善地予以反制（將其視為「威脅」）；(3)冷漠地或視若無睹地默許、接受。Schweller認為，國家面對崛起強權的政策選擇是根據它的「目標」而定，包括尋求殲滅、圍堵、從中獲利、綑綁拘束、轉化改變、與忽視等（Schweller 1999, 8）。

一、Randall Schweller歸納的七種政策選擇

根據歷史的經驗，Schweller歸納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的政策選擇有以下七種方式：(1)預防性戰爭，(2)制衡或圍堵，(3)扈從，(4)綑綁拘束或軍事同盟，(5)交往，(6)推諉或疏離，及(7)混和策略等（Schweller 1999, 7-18）。茲分述如下：

（一）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

Schweller引用Alfred Vagts的見解認為，預防性戰爭的邏輯很簡單，即把長期來看不可避免的一場戰爭提早在當下開打，以免延後開戰反而讓我方的優勢流失到敵方。預防性戰爭必須要有三個基本前提：第一、戰爭必須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長期來看，威脅一直存在；第三、現在開戰比延後開戰較好（Schweller 1999, 8）。某種程度來說，預防性戰爭對衰弱中的霸權來說是一個值得採行的戰略，尤其是當它與崛起強權衝突時，其手中可能還握有優勢。但預防性戰爭有時也會是崛起強權的選擇，雖然其總體實力不若既有強權，但透過此一策略而取得一定的戰果，如此可用於向既有強權討價還價（例如：1904~1905年日俄戰爭與1941年日本偷襲美國）。另外，預防性戰爭有可能會因為雙方都是民主政體而削弱（例如：衰弱英國與崛起美國）；也可能因為崛起強權只是想有限地修改，而非全面地推翻既有的國際秩序（Schweller 1999,

8-9)。

(二) 制衡或圍堵 (balancing or containment)

制衡係指在衝突中去對抗較強大或較具威脅的一方 (Schweller 1999, 9; Walt 1987, 17)。基本上, 它可以透過兩種方式進行: 第一、內部制衡 (internal balancing), 即透過一國之內的整軍經武而向具威脅的一方做出制衡; 第二、外部制衡 (external balancing), 係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同盟建立以對抗崛起的國家或連盟 (Schweller 1999, 9)。² 根據權力平衡理論, 制衡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1) 國家與國家必須一致行動以構成強大的力量, 而且它們力量的總和必須至少與最強的國家相當; (2) 防衛一方必須對自己與敵人的力量分佈變化有所警覺與敏感; (3) 國家必須保有動員的能量以快速果斷地回應任何權力平衡的變化; (4) 傾向維持現狀的國家不能採取防衛性的軍事態勢, 反而必須迅速發展境外武力投射; (5) 就算是最後手段, 國家也必須接受戰爭做為正當性工具, (6) 制衡的基礎—聯合 (alignments), 是不應受到意識形態、宗教信仰、或領土爭議的干擾 (Schweller 1999, 9-10)。嚴格來說, 圍堵 (containment) 是制衡的一種方式, 其本身並不尋求擊敗崛起強權, 但卻是可以避免讓它更進一步地擴張; 圍堵是用於保持平衡, 而非修補平衡 (Schweller 1999, 10; Tellis 2013, 109-124)。³ 在制衡的範疇裡, 有若干的戰術可為運用, 包括: 嚇阻 (deterrence)、制裁 (sanction)、封鎖 (blockade)、禁運 (embargo)、與凍結 (freeze) 等。

(三) 扈從 (bandwagoning)

Schweller 援用 Quincy Wright 與 Kenneth Waltz 的說法認為, 「扈從」是「制衡」的相反, 乃是邀請或吸引國家加入較強的一方, 以牽制崛起強權; 制衡或圍堵是邀請或吸引國家加入較弱的一方以牽制既有強權。有些時候強權會選擇以扈從的方式來維持權力平衡—因為在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中, 原來較強的一方正處於衰落之中, 於是它有必要尋求許多的跟隨者以支援它對崛起強權的制

² 以上的制衡方式又稱為「硬制衡」(hard balancing), 相關文獻參見Waltz (2000, 5-41); Layne (2006b, 7-41) 的研究; 相對的概念則是「軟制衡」(soft balancing), 參見Paul (2005, 46-71)。

³ 但圍堵也可能用於保持「不平衡」, 即保持較強大一方的優勢。

衡（Schweller 1999, 17, 19-21）。不論是既有強權或崛起強權，他們都有可能用扈從來吸引其他國家的加入以牽制對方。Schweller即舉例，1795~1814拿破崙帝國（既有強權）便吸引了普魯士、俄羅斯、西班牙、與奧地利的跟從；1939~1940納粹德國（崛起強權）則吸引了義大利、日本、俄羅斯、與維琪法國的附和（Schweller 1999, 10-12）。制衡與扈從兩者有很大的相似處，即是為了獲得更大的安全，但後者對許多國家而言，卻有另一個重要的目標—獲得與好處（gain and profit），尤其是戰爭勝利後的「分紅」（Schweller 1994, 72-107），或者是強權崛起所帶來的「經濟利益」（Ross 2006, 355-395）。事實上，這對吸引的一方與加入的一方，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他們的力量將因彼此而變得更大。

（四）網綁拘束或軍事同盟（binding or military alliance）

「網綁拘束」（binding）與「軍事同盟」（alliance）其實是一體兩面，皆指國家與國家相互結盟（coalition）並且正式締結條約，特別是以軍事安全目的而締約。基本上，軍事同盟的出發點是在尋求結盟國家之力量擴大。但弔詭地是，有時它並不是真正地想尋求力量的匯聚，反倒是對自己同盟夥伴做出控制。以1902英日同盟為例，因為倫敦不希望東京倒向莫斯科而危及它在遠東與亞洲的利益（Schweller 1999, 13），而當今的美日同盟亦是如此，因為美國不希望日本邁向正常化而使其軍國主義復燃，進而造成中國的恐懼（Christensen 1999, 52-57; Mastanduno 2002, 197）。Schweller進一步指出，網綁拘束具備以下幾個目標：(1)透過拘束網綁，既有強權相當程度上能滿足崛起強權對聲望與地位的要求；(2)既有強權認知到，透過如此屬於合作的途徑，它可以換取列強（包括崛起強權）對原有國際秩序的支持；(3)既有強權必須明瞭，這樣的操作也會讓它付出許多成本代價，例如崛起強權將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或影響力（Schweller 1999, 13）。準此，網綁拘束的結果與稍後所論及的調適政策後果極為相似。

（五）交往（engagement）

交往政策乃是運用非強制性的手段（non-coercive means）來改善崛起強權不符當代國際規範的若干行爲。其目標乃在於確認崛起強權會在國際秩序裡平和地改變其行爲；將崛起強權融入於既存的國際秩序當中而避免走向衝突或

戰爭 (Schweller 1999, 14)。交往政策的目標如下：(1)讓滿足現狀的國家能清楚地認識不滿現狀之崛起強權的意向和企圖；(2)讓既有強權與其他國家爭取更多的時間來結盟，以面對因不滿現狀之崛起強權而可能引發的軍事衝突；(3)打破或避免崛起強權在第一時間即可能造成危險的結盟行為，而將其吸納到既有強權的陣營裡 (Schweller 1999, 14)。根據交往的面向與廣度而言，可分為全面性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交往與選擇性 (selective engagement) 交往。對既有強權之國力與國際領導威信充滿樂觀者認為，它非但應持續對崛起強權的交往政策，也應該進行深度交往 (deep engagement) 或強化交往 (enhanced engagement) (Ikenberry 2008, 23-37; Brooks, Ikenberry, and Wohlforth 2012, 7-51)。交往政策的典型例子是七〇年代後期的美國對中國。

Schweller認為，交往政策中最普遍也是最消極的作為即是「綏靖安撫」(appeasement)，係指藉由理性的協商與妥協來容許、滿足崛起強權在國際爭端上的要求，如此以避免昂貴與血腥的軍事衝突發生 (Schweller 1999, 14; Rock 2000, 10-12)，典型的例子為二戰前的英國對德國。然而，交往比綏靖安撫更為積極主動，因為它是想透過「社會化」(socialize)的方式將不滿現狀的崛起強權導入既有的國際秩序，使其接受並遵守當中的規範。因此，交往可以是制衡或圍堵的一種替代方式，是把不滿的崛起強權拉進既有強權這一邊。但交往政策也有風險，例如崛起強權可能會倒戈 (Schweller 1999, 14-15)，或是另外自立門戶。

(六) 推諉或疏離 (buck-passing or distancing)

推諉乃是國家在制衡崛起強權時想做個「搭便車者」(to ride free)。在共同負擔對抗與制衡崛起強權時，有些國家基於自利與投機的心理，例如：考慮自身的防衛利益 (defense advantage) 及消耗戰爭 (wars of attrition)，於是認為它可以選擇站在競技場邊而不需擔負任何對抗制衡的成本，同時將該成本轉嫁給其他夥伴，由他們來承擔。類似的作法包括「疏離」(distancing)、「躲藏」(hiding)、或「避險」(hedging)。尤其是當它們發現，就算它們總加起來的力量都不足以嚇阻或擊敗崛起強權時。通常較不直接受到威脅的國家會採取疏離、閃躲的作為，選擇不與較直接受到威脅的國家進行外交與軍事合作 (Schweller 1999, 16-17)。Schweller即舉例，面對納粹德國的興起，英

國便採取了推諉疏離法國的策略，將戰爭的風險直接推給了巴黎。

（七）混合策略（mixed strategies）

然而，上述的六種政策選擇並非是互相排斥，而是可以交替或同時採用。例如：當今美國的中國政策即是一個混合著「既交往又制衡圍堵」的策略。有時候，一個政策或戰略可能會兼具著許多面向的思考，例如：在二戰前夕由莫斯科與柏林所簽訂的「德蘇互不侵犯協定」（The 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Schweller認為從蘇聯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它是「扈從」，因為莫斯科選擇加入較強大與較具威脅的德國一邊；二方面，它也是「推諉」，因為莫斯科把德國可能發動軍事攻擊的方向從東邊導引到西邊，蘇聯將因德國與英、法之間的戰鬥而從中獲得喘息；三方面，它也是「制衡」，因為莫斯科將因此而爭取到時間來做內部的整軍經武，以應付未來與柏林的一場戰爭（Schweller 1999, 17-18）。

二、對Randall Schweller歸納的補充

本文認為，根據實際政策運作與學術不同觀點，另有以下四項可為選擇：(1)戰略夥伴關係，(2)調適或適應，(3)戰略再保證，及(4)離岸平衡。

（一）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

戰略夥伴關係是後冷戰時期被強權廣為運用之合作或連合的一種新制度形態，係強調或合理化兩個尋求共同利益之國家所建立的一種關係，雖然有時候它們在若干國家利益上是處於「競爭多於分享」的情況（Kay 2000, 15; Nadkarni 2010, 44-51; 陳亮智 2014, 4）。戰略夥伴關係不若綑綁拘束與軍事同盟之可藉由條約締結而約束夥伴國家彼此，甚至它們在若干事涉國家之戰略安全與利益是具有「競爭」關係，但是它們在許多國際事務上卻也有更廣泛的「合作」關係（包括前述之戰略與安全）。有時候，戰略夥伴國家的合作程度甚至可能會超越軍事同盟國家。由於它的彈性，以及夥伴國家在此關係中的互萌其利，戰略夥伴關係即被許多強權所採用，例如：中俄（1994）、美中（1997）、印俄（2000）、中印（2005）、美俄（2010）、及美印（2011）等戰略夥伴關係。

(二) 調適或適應 (accommodation)

調適或適應非屬於制衡、對抗的一方，而是傾向於交往的一端，但它並不是盲從於崛起強權。主要是在面對崛起強權時，既有強權並不感到害怕，同時也不會選擇逃避或疏離，而是積極地尋求與其合作，進而創造和平穩定 (Kang 2007, 53; Friedberg 2015, 94-95)。T.V. Paul認為調適政策可區分為幾種類型 (Paul 2016, 16-19)：(1)意識形態或規範性的 (ideological/normative) 調適，即既有強權與崛起強權對國際秩序中的核心意識形態或規範性價值達成共識；(2)領域上的 (territorial) 調適，係指兩者在領域的現狀上有所共識，並且互相承認、尊重對方的勢力範圍 (spheres of influence) (Ross 1999, 81-118; Glaser 2015, 56-58)；(3)經濟的 (economic) 調適，是指崛起強權的經濟實力與國際經濟影響力獲得既有強權的承認，且享有一定的發言權；以及(4)制度的 (institutional) 調適，乃是崛起強權在轉變的國際秩序與建制裡，獲得既有強權的承認而享有相當的地位與發言權。當今的美國對中國便是調適政策的一例，因為華盛頓在許多方面正努力學習適應北京日漸強大的影響力；許多文獻也主張美國應該捨棄與中國進行軍事對抗，轉而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並努力與中方共建東亞的和平與安全 (Kissinger 2011; White 2012; Glaser 2015, 49-90)。

調適似乎是既有強權在面對崛起強權時所不得不採取的策略。除非選擇逃避、推諉、或疏離，否則仍必須面對新興強權崛起時所造成的衝擊。此外，雖然調適政策可為既有強權與崛起強權之間創造合作與和諧，但它亦有風險存在。以華盛頓為例，調適的作法可能會讓北京認為，美國沒有捍衛其重要利益的決心；同時也可能讓美國失信於它的重要盟邦 (尤其是東京)；也可能讓國際社會認為美國會選擇犧牲非安全的利益 (nonsecurity interest)，例如對自由民主的支持 (若美國放棄台灣) (Glaser 2015, 51)。基本上，調適是既有強權接受崛起強權壯大的事實，並且與其保持良好的互動。但其中有一關鍵是既有強權要適應到何種程度？是否適應得宜？若是對崛起強權讓步太多，則可能成為「綏靖安撫」，二戰之前的英國對德國即是。又過於讓步，甚至是讓出原先由既有強權所控制的勢力範圍，則可能成為「戰略收縮」 (retrenchment) (MacDonald and Parent 2011, 11-13)。

（三）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

離岸平衡政策可視為是調適政策的一種，即在面對崛起強權時，既有強權雖是採取了撤出原來所據的勢力範圍，包括撤軍與終止軍事同盟條約，但它並非是選擇逃避疏離，而是鼓勵其同盟夥伴「親上火線」與崛起強權抗衡，而既有強權則是協助他們以對抗崛起強權。Christopher Layne認為，華盛頓的最終利益是避免一個橫跨歐亞的霸權產生。因此只要能達成此目標，由它來制衡崛起強權，或由其他美國的同盟國家來制衡崛起強權，都可以接受（Layne 2006a, 160）。但美國位居第一線的結果卻是同盟國搭便車，尤其是他們在軍備上的低度投資（主要是日本、南韓、與台灣），因此美國必須改弦更張而採離岸平衡。準此，美國將達成四項主要目標：第一、避免捲入歐洲或亞洲強權之間的戰爭；第二、避免為「信譽」（credibility）而戰，或為其同盟夥伴打不必要的戰爭；第三、避免美國本土遭受恐怖主義攻擊；第四、達成戰略上對美國國力與行動自由的最小限縮（Layne 2006a, 160）。當然，離岸平衡也有風險，即其有可能失信於它的同盟夥伴，也可能讓崛起強權趁機擴大因退出所空出的勢力範圍，以及被認為其本身就是戰略收縮。

（四）戰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

戰略再保證也是交往政策的一種特別形態，是指衝突的每一方均可找出具體措施，以消弭對方對我之戰略意圖的憂慮（Steinberg and O'Hanlon 2014, 5）。特別是，由既有強權向崛起強權做出明確的宣示，要求雙方皆採取自制（self-restraint）的手段以降低敵意，同時也在此過程中增加彼此意圖與能力的透明、理解（Steinberg and O'Hanlon 2014, 205）。它包括以下五個重要方法：節制（restraint）、強化（reinforcement）、透明（transparency）、彈性（resilience）、與決心（resolve）（Steinberg and O'Hanlon 2014, 6-11）。根據James Steinberg與 Michael E. O'Hanlon的看法，戰略再保證有兩個目標：第一、努力降低彼此對對方安全策略的不確定性；第二、針對對方非善意的意圖，提供及時的警告，反映新的狀況，並給予兩強充分的時間來做調整（Steinberg and O'Hanlon 2014, 1-6）。此概念是從冷戰的經驗而來，但Steinberg與O'Hanlon認為，此政策的重點不在於像美蘇兩國之化為正式的限武條約，而是在雙方漫長的接觸過程裡，避免任何可能的擦槍走火，並減低一方採

取先發制人（preemption）的誘因。更重要的是，藉此方式可以促成兩強在諸多共同關心的議題上進行合作，而非競爭（Friedberg 2015, 94）。

戰略再保證在歐巴馬政府時代被廣泛地強調。時任副國務卿Steinberg便指出，美國與其同盟夥伴應該意識到「中國的到來」，並且希望中國可以成爲一個繁榮且成功的強權；而華盛頓應選擇與北京合作，而非相互競爭與對抗。但是中國也必須保證它的發展不會危及到其他國家的安全和福祉（Steinberg 2009）。Steinberg與O'Hanlon認爲，戰略再保證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中關係裡的「台灣議題」。從韓戰結束以來，美國即一方面協防台灣，另一方面反對台灣反攻大陸。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華盛頓一方面不斷地向北京重申三項聯合公報與「三不」政策，另一方面不斷地向台北強調《台灣關係法》與對台「六項保證」。美國一再巧妙地運用此政策而避免兩岸陷入軍事衝突危機當中，進而也將美國捲入（Steinberg and O'Hanlon 2014, 1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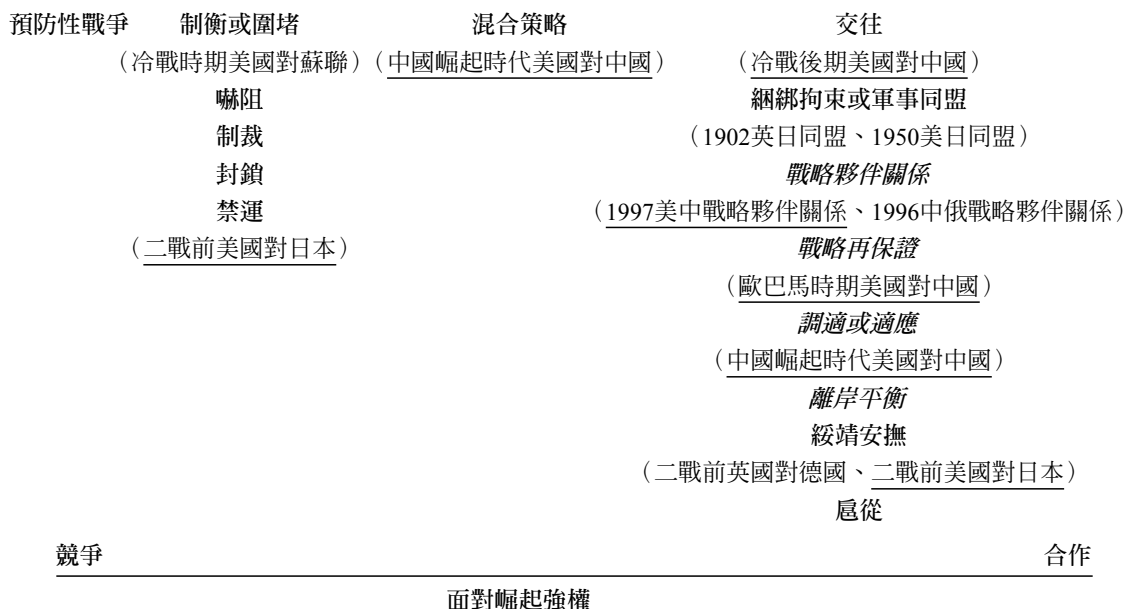
三、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之政策選擇：在「競爭 vs. 合作」光譜上

就上述十一種政策選擇來看，首先，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的回應可以區分爲「面對 vs. 規避」。規避的部分較爲單純，只有推諉或疏離一項，即既有強權選擇「不去面對」崛起強權，同時也選擇疏離它的戰略夥伴，它與其他選擇「面對」崛起強權的作法差別很大。面對的部分較爲複雜，其他十項皆在當中。

其次，以一個「競爭 vs. 合作」的光譜來看（左爲「競爭」，右爲「合作」），則此十項政策選擇可在光譜當中清楚地標示出其「位置」（請見圖1）。在「面對」的區塊，依競爭與合作的不同程度，很顯然地，預防性戰爭與制衡（或圍堵）是位處於「競爭」的一端；交往及其他政策選擇則座落於「合作」的一方；混合策略則是位在光譜中間。再者，由於預防性戰爭是戰爭行爲，其衝突性比制衡更爲嚴重，因此是在最左方。而關於混合策略，雖說它是位處在光譜中間，但它並不是一個「靜態的」（static）概念或狀態。相反地，它是「動態的」（dynamic），是隨著政策中的「競爭」與「合作」之程度差異而變化。換言之，當制衡或圍堵多於交往或扈從時，則混合策略是偏向

「競爭」一方；反之，則偏向「合作」一端。

圖1 「競爭 vs. 合作」光譜中之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的政策選擇



規避崛起強權

推諉 / 疏離

(二戰前英國對法國、二戰前蘇聯對法國)

說明：標示斜體的字體是對Schweller歸納的補充；嚇阻、制裁、封鎖、與禁運是制衡或圍堵中的策略；畫線的部分則是本文的案例。

資料來源：作者繪圖。

參、既有強權與崛起強權之力量對比：美日 (1931~1941) 與美中 (1993~2018)

本節分別在兩個時空 (1931~1941與1993-2018)，對照並比較「美日」及「美中」的經濟與軍事力量變化，如此以觀察既有強權華盛頓分別與崛起強權東京、北京的實力對比。其中，經濟面向主要是以國家的「購買力平價下

之國內平均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at purchasing power parity)為指標(以下簡稱為「國內生產毛額」);軍事面向則是以國家的「軍事支出」(military expenditure)為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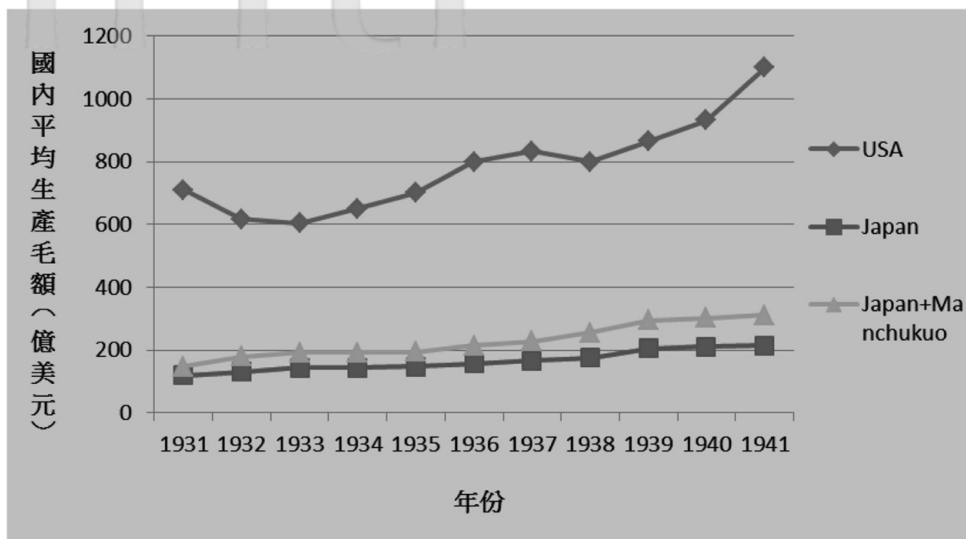
一、既有強權美國 vs. 崛起強權日本 (1931~1941)

首先,在1931~1941年「美國 vs. 日本」的經濟實力對比上,根據William D. O'Neil於2003年的研究報告顯示,1931到1941年之間,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是從1931年的7100億美元上升到1941年的1兆100億美元,成長了1.55倍,年平均成長率為5.50%。同一時期,日本的國內生產毛額是從1931年的1200億美元上升到1941年的2140億美元,成長了1.78倍,年平均成長率為7.83%。有趣的是,若是把滿州國的國內生產毛額併入日本本國計算,則「日本 + 滿州國」是從1931年的1480億美元上升到1941年的3110億美元,成長了2.10倍,年平均成長率為11.01%(請見圖2)。而美日兩國在此一項目上的比值也從1931年的5.92:1(美國:日本 + 滿州國 = 4.80:1)縮小至1941年的5.14:1(美國:日本 + 滿州國 = 3.54:1)。其中,美國與日本 + 滿州國縮小的程度更大。

準此,雖此一時期日本總體經濟實力與美國仍有一段差距,但顯見日本的經濟規模是快速地成長,且成長幅度優於美國,處於追趕美國的階段。本文認為這是東京能與華盛頓進行抗衡的重要基礎。此外,根據這一份統計,我們亦發現,滿州國對日本的經濟成長具有很大的幫助(有助於提升日本總體國內生產能量,縮小與美國的經濟實力差距),這可以支持當時日本選擇佔領中國東北的戰略佈局(黃美蓉 2017, 225-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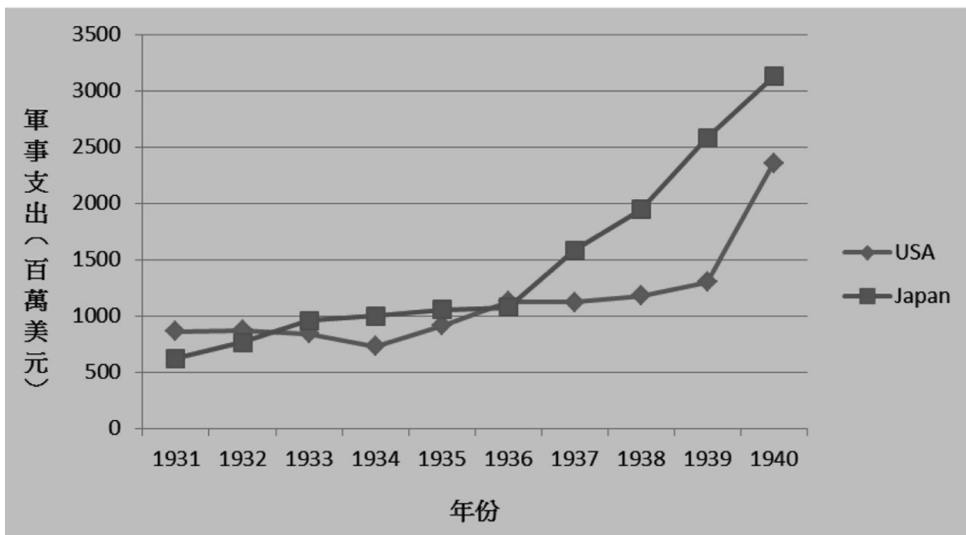
在軍事實力對比上,根據O'Neil的研究報告顯示,1931~1940年之間,美國總軍事支出從1931年的8億6100萬美元上升到1940年的22億6400萬美元,漲幅為2.74倍,年平均成長率為19%。同一時期,日本總軍事支出則是從1931年的6億2200萬美元上升到1940年的31億2800萬美元,漲幅為5.03倍,年平均成長率為45%(請見圖3)。事實上,在1933~1935年及1937~1940年兩個階段,日本總軍事支出是超越美國;美日兩國在此項目的比值也從1931年的1.38:1縮小至1940年的0.72:1。對照前述之美日經濟實力對比,很顯然地,崛起日本在軍事支出的投注上是超越既有強權美國。準此,本文認為,此一時期的華盛頓與

圖2 1931~1941年，美國與日本之國內平均生產毛額分布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O'Neil (2003b, 5-8)。

圖3 1931~1940年，美國與日本之軍事支出分布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O'Neil (2003b, 27-28, 31)。

東京皆在進行軍備擴張與軍備競賽，而領先的地位則互有超前。

二、既有強權美國 vs. 崛起強權中國（1993~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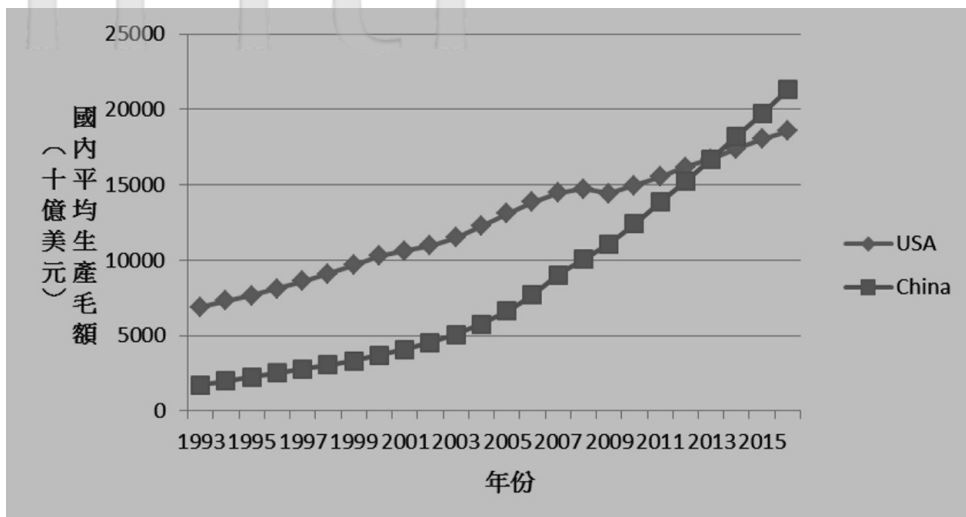
在1993~2018年「美國 vs. 中國」的經濟實力對比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資料顯示，1993到2016年間，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是從1993年的6兆8790億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18兆5690億美元，成長了2.70倍，年平均成長率為7.40%。同一時期，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則是從1993年的1兆7220億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21兆2910億美元（超越了美國），成長了12.36倍，年平均成長率為49%（請見圖4）。而兩國在此項目上的比值也從1993年的3.99縮小至2016年的0.87。總體而言，雖此一時期的中國的經濟實力及國內總體生產能量與美國仍有一段差距，但顯見中國的經濟是呈現快速地成長，且成長幅度優於美國，其經濟實力正追趕上美國，甚至超越美國。此一趨勢與前述的日本經驗極為類似。準此，這也是北京能與華盛頓進行抗衡的一個重要支撐點。

在軍事實力對比部分，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的統計顯示，1993到2016年間，美國總軍事支出是從1993年的4883億4200萬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6062億3300萬美元，漲幅為1.24倍，年平均成長率為1%。同一時期，中國總軍事支出則是從1993年的262億4000萬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2257億1300萬美元，漲幅為8.60倍，年平均成長率為33%（請見圖5）。兩國在此項目上的比值從1993年的18.61縮小至2016年的2.69。與前述美日兩國軍事實力對比相似者是，雖此一階段的中國軍事實力與美國仍有一段很大的差距，然而中國軍事支出卻以極為快速的幅度成長（但比1931~1941日本要低，中國：日本 = 33%：45%）。準此，本文認為，這一階段的美中兩國也都是有計畫地進行軍備擴張，雙方儼然在進行軍備競賽。

綜合以上兩個組合在經濟、軍事上的數據資料，本文歸納以下幾點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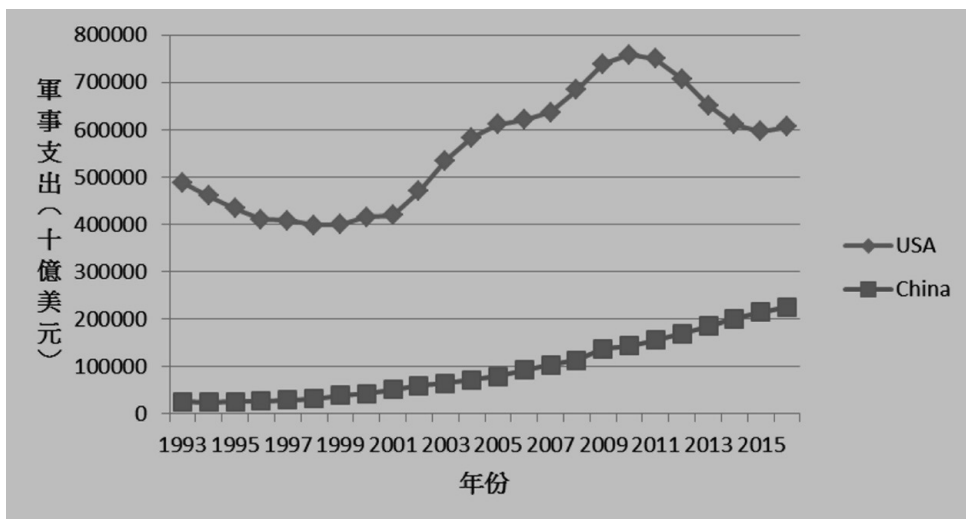
- （一）不論是從經濟或軍事的角度，崛起強權日本與中國確實都在追趕既有強權美國，且他們的成長倍數、平均成長速度皆優於美國，與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都在縮短當中（雖然與美國的規模仍有一段差距）（請見表

圖4 1993~2018年，美國與中國之國內平均生產毛額分布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8)。

圖5 1993~2018年，美國與中國之軍事支出分布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8)。

1與表2)。

- (二) 在經濟成長上，1931~1941美國比1993~2018年美國稍微遲緩。而在崛起強權方面，1993-2018年中國則遠優於1931~1941年日本，成長倍數是12.36倍(中)比2.10倍(日)，年平均成長率是49%(中)比11.01%(日)。2016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則是超越了美國(請見表1)。
- (三) 在軍事成長上，1931~1941年美國比1993~2018年美國迅速。而在崛起強權方面，1931~1941年日本與1993~2018年中國比較，成長倍數是5.03倍(日)比8.60倍(中)(日劣於中)，但年平均成長率是45%(日)比33%(中)(日優於中)。1933~1935年及1937~1940年，日本軍事支出是超越美國。準此，1931~1941年日本的軍力擴張與1993~2018年中國是相仿的(請見表2)。

表1 1931~1941美日與1993~2018美中之經濟成長的比較

項目	國家	1931	1941	國家	1993	2018
成長 倍數	美國	1.55		美國	2.70	
	日本(+滿州國)	2.10		中國	12.36	
年平均成長率	美國	5.50%		美國	7.40%	
	日本	11.01%		中國	49%	
比值	美國：日本	4.80	3.51	美國：中國	3.99	0.87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表2 1931~1941美日與1993~2018美中之軍事支出的比較

項目	國家	1931	1940	國家	1993	2018
成長 倍數	美國	2.74		美國	1.24	
	日本	5.03		中國	8.60	
年平均成長率	美國	19%		美國	1%	
	日本	45%		中國	33%	
比值	美國：日本	1.38	0.72	美國：中國	18.61	2.69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肆、既有強權美國對崛起強權日本（1931~1941）與崛起強權中國（1993~2018）的政策選擇比較

本節根據前述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之政策選擇架構，從「外交軍事」與「國際經濟」兩個面向，比較日本與中國崛起的作為，並對照比較美國在1931~1941年與1993~2018年對他們的回應。

一、外交與軍事面向

在外交與軍事上，1931~1941年日本主要是運用現實主義理論中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手段，透過國際結盟與軍事擴張方式以達成它的國家目標。而此時期的美國，則是先採取「中立、綏靖」，但也保持與日「外交交涉」；再轉而採取「制衡」，但也繼續保持「外交斡旋」；最終則以「戰爭」回應日本。相對地，隨著國力日漸增強，1993~2018年中國在外交上顯得靈活而多元，軍事上採取漸進式地擴張。除中朝軍事同盟之外，北京大量運用「戰略夥伴關係」模式與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進行大國外交，同時也努力宣傳其「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強調它無意挑戰美國霸權。此一時期的美國，基本上是延續了1972年以來的對中「交往」政策。然而隨著中國各種威脅的加劇，美國逐漸加強其對中國的「制衡或圍堵」，其中又以歐巴馬與川普兩個政府尤為顯著，而後者又比前者更為明顯。總體而言，美國的對中政策是從「交往」走向「混合策略」（即「既交往又制衡」），而「制衡」的比重則愈加增高。

（一）1931~1941：國際結盟與激進擴張的日本 vs. 從容忍、綏靖到制衡，再到戰爭的美國

1931~1941年日本不斷地運用國際結盟、軍事擴張與戰爭的方式以達成它的戰略目標；而美國的回應則是先採取中立、容忍、與綏靖，之後改採制衡圍堵。首先，1931年9月，日本發動滿州事變（又稱九一八事變）進而佔領中國東北，並建立滿州國。為此，美國拒絕承認滿州國是日本的一部分。然而，除了外交表態以外，美國並未採取任何實質的軍事或經濟制裁。該消極作為係時任國務卿Henry Stimson之所為，也因此被稱為「史汀生主義」（The

Stimson Doctrine)。⁴ 而整個1920與1930年代，列強則落入瘋狂的軍備競賽當中。為了限制日本海軍的擴張，英美兩國遂透過一系列的國際會議與條約予以牽制。⁵ 因為各國皆未信守條約的規範，所以美國限制日本擴軍的目標並未成功。況且在此期間，華盛頓亦未終止與日本的貿易，特別是鐵、鋼、石油等戰略物資仍繼續輸往日本。1935~1936年間，美國國會開始通過一系列的「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s），禁止美國運交作戰物資給交戰國家，以避免美國捲入任何在歐洲或亞洲的戰爭。然而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並未真正地批准實行，一方面他希望美國仍可以支助中國對抗日本，二方面他則不希望切斷美日之間的貿易往來。1937年12月，發生了日軍轟炸美艦「帕耐號事件」（The USS Panay Incident），其雖引發美日兩國的緊張關係，但是為了避免衝突，華盛頓最終還是選擇接受東京的道歉與賠償（Plante 2003, 101-111）。

在面對日本初期的崛起與擴張時，華盛頓並未對東京做出大幅且有效的制衡措施，而是採取某種程度的「容忍」與「綏靖」。根據前述的定義，綏靖是藉由理性的協商與妥協而容許、滿足崛起強權在國際爭端上的要求，如此以避免昂貴與血腥的軍事衝突（Schweller 1999, 17-18）。當東京極力在遠東擴張其勢力範圍時，華盛頓並無採取強硬的反制措施，而是消極地批評，卻又被迫接受日本的侵略擴張。這當中有幾點是值得關注的：第一、在第二次中日戰爭問題上，美國一開始是保持中立（neutrality），然此中立卻與傳統的中立有所不同。傳統者是在交戰的兩造當中，保持不支持任何一方。然美國此時的中立卻是一方面消極地支持中國抗日，另一方面則維持與日本的貿易關係（隨著戰事的擴大，美國多數民意開始轉向同情且支持中國）。第二、美國此一時期對日本的包容，相當程度是受到國內長久以來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所

⁴ 事實上，日本在中國的軍力擴張可追溯到1895年的第一次中日戰爭（又稱甲午戰爭或日清戰爭），以及1905年的日俄戰爭。前者讓日本勢力進入台灣、朝鮮半島、與東海（遼東半島後來在俄、德、法三國干涉之下，被迫歸還中國），後者則讓日本勢力進入遼東半島與南滿。

⁵ 主要是「華盛頓海軍條約」（The Washington Naval Treaty, 1922.2.6-1936.12.31），又稱「五國關於限制海軍軍備條約」（The Five-Power Treaty）。其中規範美、英、日、法、義五國主力艦總噸數比為5：5：3：1.75：1.75。

影響；華盛頓本身對於介入海外的軍事衝突抱持極大的保留態度（Sun 1993, 131-136; Wittkopf, Jones, and Kegley 2003, 37-39）。第三、美國長久以來在遠東採行「門戶開放」（The Open Door）政策，只要日本擴張不違反此一原則並傷及美國利益，華盛頓不會做出進一步的反制措施（Iriye 1987, 66-67; Layne 2006b, 32; Roy 2009, 35）。但就在東京持續的擴張中，美國的態度也開始出現了改變。

1937年7月，日本與中國爆發全面性戰爭。此時中國乃寄望美、英、法等國能調停中日戰爭。但羅斯福總統卻不認為美國能扮演調停的角色，或抗議日本違反「九國公約」（The Nine Power Treaty, 1922）的規定。⁶9月，羅斯福總統宣佈美國政府船隻不再運送作戰物資給中國或日本（但民間船隻則不在此限）。10月，羅斯福總統表示，日本在中國的行動是視國際法於無物，應該予以隔離（quarantined）（Sun 1993, 131-132）。1939年7月，日本封鎖英國在天津的租界。為此，美國支持英國，並宣佈撤除美日「通商航海條約」（The 1911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Treaty），禁止兩國進行任何的貿易往來（Roy 2009, 34; 周保雄 2016, 26）。而在1937~1940年之間，日本在中國的戰事進展並不如預期的順利。為了保有在中國戰場上的成果，並從中國的後方包夾在重慶的國民政府，以及從東南亞獲取重要的戰略物資，1940年8月，日本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The Great East Asia Co-Prospersity Sphere）（即所謂「亞洲版的門羅主義」），訴求讓亞洲殖民地脫離西方帝國主義的統治，讓「亞洲回歸到亞洲人的亞洲」（Taliaferro 2016, 188-189）。9月，日軍迅速佔領法屬中南半島，並與法國維琪政府簽訂協議，於此日本勢力正式進入東南亞。1940年9月27日，日本與德國、義大利締結「三國同盟條約」（The Tripartite Pact），此為各方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1941年4月，日本與蘇聯簽訂「日蘇中立條約」（The Soviet-Japanese Neutrality Pact），以此避免與蘇聯開戰而穩住北方局勢，再則是有利於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進一步擴張。

⁶ 1922年，美國發起並邀請中國、英國、法國、日本、義大利、荷蘭、葡萄牙、比利時等九國共同參與太平洋會議。會後簽署九國公約，主要是確保中國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美國則重申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與貿易機會平等。

根據美國國務院歷史學家辦公室的網站資料「里程碑：1937-1945，『日本，中國，美國和通往珍珠港的道路，1937-41』」指出，從1938年開始，隨著日本顯現其入侵東南亞的企圖，華盛頓逐漸放棄對東京的容忍與綏靖，轉而採取「制衡或圍堵」以牽制日本力量的擴大。主要作法包括：「凍結」日本在美國的資產，「禁運」重要戰略物資輸往日本，以及加強美軍在太平洋的部署等。自1939年9月，美國撤除「美日通商航海條約」；1940~1941年，美國開始採取禁運措施，漸進地封鎖日本進行戰爭所需的物資。同時，美國也透過「租借法案」(The Lend-Lease Program)立法，擴大對中國與歐洲同盟國的經濟與物資援助。爲了反制美國，1940年1月，日本也廢止與美國的通商條約，並加大在西太平洋的擴張，包括：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8月)，佔領法屬中南半島(9月)，以及與締結德義日三國同盟條約(9月)(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2018)。

而爲了再反制日本的威脅，美國進一步採取：第一、凍結日本在美所有資產；第二、對日本實施全面禁運；第三、暫時終止與日本的外交談判；第四、透過滇緬公路對中國提供軍事援助。最後，因爲迫於形勢，東京選擇偷襲珍珠港，美日兩國則走向戰爭。在此期間，雖然美國與日本的外交交涉仍持續地進行(馬文博 2015, 215-244)，但美國對日本的制衡或圍堵態勢已經成形。根據前述之定義，制衡可以是在衝突中去對抗較具威脅的一方(Schweller 1999, 7-18)。由於美國已感受到日本威脅的逐漸加劇(而日本亦感受到美國對其擴張的限制)，因此開始採取制衡措施。然而華盛頓主要的制衡行爲是內部制衡，即自我的整軍經武及強化在太平洋的部署，而非外部制衡(美國在珍珠港事變後才加入同盟國)。此外，亦根據前述之定義，圍堵是不尋求擊敗崛起強權，而是避免讓它進一步地擴張；圍堵是用於保持平衡，而非修補平衡(Schweller 1999, 9)。當時的華盛頓似乎並無意願去擊敗東京，而是傾向於避免讓日本持續擴張而稱霸西太平洋，如此以維持美日雙方在西太平洋的權力平衡關係。顯然地，由於日本破壞了權力平衡，美國遂進行修補權力平衡。

(二) 1993~2018：彈性多元與漸進擴張的中國 vs. 從交往到既交往又制衡的美國

在外交上，1993~2018年中國的外交則非以權力平衡爲基礎，而是呈現相

對的彈性與多元，包括：援助第三世界與開發中國家的「南南外交」，敦親睦鄰的「周邊外交」，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經濟外交」，強調與八大工業國家互動的「大國外交」，以及透過軟實力與柔性國力的「柔性外交」等（蔡東杰 2011, 8-12）。在軍事上，此一時期的中國的軍事作為則採取內部制衡方式，而非對外戰爭。然而，北京以其軍事實力為後盾，在若干領土主權問題上（主要是東海與南海）採取強硬的立場，同時也加強解放軍在第一島鏈的穿越航行，著實給和中國有主權爭議的國家帶來嚴重的挑戰。面對中國崛起，美國的政策選擇也顯得相當的彈性與多元。一方面，除了延續1972年以來的「交往」之外，華盛頓亦採行了「戰略夥伴關係」策略。二方面，為了因應北京的軍事威脅，華盛頓也逐漸採取「制衡或圍堵」策略。整體來說，美國的對中政策是從「交往」走向「混合策略」（即「既交往又制衡」），而「制衡或圍堵」的比重則愈加增高，尤以歐巴馬與川普為甚，而後者又更勝於前者。

1. 1993~2001柯林頓政府的對中政策

1990年代美國的中國政策基本上是延續1972年以來的交往策略。此一時期，北京雖已逐漸在經濟與軍事上展露其快速的成長，而「中國威脅論」也一度流傳於國際社會（Roy 1994, 149-168; Bernstein and Murnro 1997, 18-32），但中國崛起對美國及亞太地區的衝擊則非今日之明顯。1993年7月發生「銀河號事件」，中方雖為美方所迫而受檢，但事件終究是和平落幕。然1995年7月與1996年3月所發生的台海危機，則讓美中雙方瀕臨互相用兵的邊緣。之後急轉式地發展是，美中兩國發展出「全面交往」與「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1997年11月江澤民到美國進行國是訪問，此為六四事件後第一位中國元首訪問美國；1998年6月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則回訪中國，並於上海宣佈「三不政策」。⁷ 雖然1999年5月發生了美軍「誤炸」中國駐塞爾維亞貝爾格勒大使館事件而一度讓雙方關係陷入緊張，但華盛頓與北京皆無意走向軍事解決。

此一時期，柯林頓總統的對中政策是以擴大交往為基礎，希冀透過對北京

⁷ 即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任何必須以國家為資格的國際組織。

非強制性的邀請與互動，而在各個領域展開對話與交流。其最重要目標即是希望改變崛起中國的行為，促其符合西方現代文明的標準（例如：尊重人權、力行法治），且讓其融入既存的國際秩序與建制中，而避免走向衝突或戰爭（Shambaugh 1996, 180-209; Ross 1999, 176-206）。與過去對北京進行開放交流很大不同的是，此時的華盛頓選擇與北京發展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雖然美中兩國存有許多的歧見，但雙方在許多議題上仍有共同利益（例如：對抗恐怖主義與全球氣候變遷），因此兩國必需針對戰略性的問題尋求合作（Yang 1999, 49-66）。甚至，美中兩國也可以在歧見與衝突上尋求對話、交流、合作（例如：區域安全問題），如此以增進瞭解，減低誤解，化競爭為合作，共創雙贏。

2. 2001~2009小布希政府的對中政策

此一時期的中美關係基本上仍是延續先前的交往與戰略夥伴關係。但2001年4月發生的美中軍機擦撞事件，再次讓雙方關係陷入低盪。然而，再一次地，兩國仍無意以軍事手段解決紛爭。在小布希（George Bush）總統向中方表示「兩個遺憾」之後，此事件和平落幕而兩國關係又重新恢復。2001年9月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著實地改變了美國的戰略重心，同時也為下一階段的美中關係預留伏筆（中國崛起與美國重返亞洲）。為推動反恐戰爭，美國將其政治、外交、軍事力量轉至中東；同時也尋求北京的支持與合作（Gurtov 2006, 1-40）。另一方面，北京則公開支持打擊恐怖主義，並與美國展開反恐對話與合作。從某種角度而言，因為反恐戰爭，華盛頓對北京的定位乃是「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關係超越「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關係。北京對美國霸權是採取「韜光養晦」策略——在國內繼續保持經濟與軍事成長，在國際上推動「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論述以化解區域國家與美國對中國崛起的疑慮（Shirk 2007, 240-241）。

如同上一階段，小布希總統的中國政策基調仍是「交往」，輔以「戰略夥伴關係」。而且，因為反恐戰爭的關係，此時的美中交往與戰略夥伴關係是有加強的趨勢（例如2006年10月，美中共同推動「六方會談」以因應北韓核試驗）。另一方面，華盛頓並非無視北京的經濟與軍事崛起，而是受限於反恐戰爭而無暇於制衡或圍堵中國。為了進一步深化兩國的交往，2005年9月，

美國提出期待中國做為「負責任的大國」（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並再次強調美中雙方的可合作性（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2005）。儘管各方（尤其是美方內部）對「負責任的大國」定義與標準有許多爭論（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7），但美國仍希望崛起中國能改變其行為，融入已有的國際秩序，並為區域安全穩定做出貢獻。整體而言，小布希與柯林頓兩者的中國政策十分類似。

3. 2009~2017歐巴馬政府的對中政策

此一時期美國對中國的政策選擇仍是延續先前的交往與戰略夥伴關係，同時也採行了「調適與適應」及「戰略再保證」。⁸ 首先，2009年4月，在倫敦召開的二十大開發中國家會議裡，美中同意建立「積極、合作與全面的21世紀美中關係」，並共同提出「兩大國」（G2）之間的戰略與經濟對話（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 SED）。2012年5月，中方則提出「兩個C」（C2）的概念，以強調美中之間的協調（coordination）與合作（cooperation）。顯然地，美中兩國希冀將既有的戰略夥伴關係予以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並透過一系列主題式的對話與交流而增進雙方的瞭解與合作。此可謂是交往與戰略夥伴關係的運用。同時由於美國亦努力適應、接受中國日漸強大的影響力，因此這也是「調適與適應」。

然而與小布希政府所不同的是，隨著反恐戰爭的告一段落，以及解放軍不斷地穿越第一島鏈，華盛頓遂進行「重返亞洲」與對亞太「再平衡」的戰略重心轉移，逐漸在對中政策裡加強「制衡或圍堵」的元素。2009年7月，歐巴馬政府宣佈美國將「重返亞洲」並對亞太進行「再平衡」（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0; Calmes 2011; Clinton 2011, 56-63; Friedberg 2011; Liberthal 2011）。隨即，華盛頓便展開一系列強化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作為，包括軍事力量的重新部署，加強與同盟國與非同盟國的軍事合作（特別是美日軍事同盟，包括支

⁸ 由於歐巴馬政府並未正式聲稱美國採行「調適與適應」及「戰略再保證」政策，因此本文對此兩策略以加註引號的方式呈現。其中有關「戰略再保證」的部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保證是有條件的，換言之，美國歡迎中國崛起，但中國崛起必須是和平的，中國必須是負責任的大國，且不該破壞或修正現存的國際秩序，並且必須保證其發展不會危及其他國家。

持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及新安保法通過），因應東海與南海主權爭議的問題，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以及尋求與亞太國家的區域經濟整合等。美國此一作為被認為是為了回應中國的崛起，以及它對亞太區域安全可能形成的威脅（Ratner 2013, 21-38; 蔡曉卉 2015）。中國方面由於總體國力日趨強盛，北京方面除了延續和平發展基調，也提出建立美中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6月7日會見美國總統歐巴馬時指出，「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中國無意挑戰美國霸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3）；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則是在2015年6月27日指出，中美關係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中國新聞網 2015）。美方對此，一則表示歡迎中國和平崛起，也期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大國；二則並未附和中方說法，而表示新型大國關係不該只是概念（concept），端看中國如何行動（action）（Want China Times 2015）。副國務卿Steinberg也指出，美國（與其同盟）應該意識到「中國的到來」，並且希望中國可以成為一個繁榮、成功的強權；但是中國也必須保證它的發展不會危及到其他國家的安全和福祉（Steinberg 2009）。

4. 2017~2018川普政府的對中政策

2017年1月就任的川普總統，其對中國的政策出現了重大轉變。雖然華盛頓並未揚棄原來與北京的交往與戰略夥伴關係，但川普政府卻甚少著墨此兩者，反而是將北京視為「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與「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2017年12月所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即認為中國與俄羅斯已嚴重地挑戰美國的權力、影響力與利益，並有意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榮基礎（The White House 2017a, 2）。⁹ 川普政府更指出，美國過去二十年對中國所採取的交往政策是失敗錯誤的，因為中國並未藉著融入國際建制與自由貿易而成為一個良善且值得信賴的夥伴（The White House 2017a, 3）。相反地，北京是試圖取代華盛頓以建立符合其價值與利益的新國際秩序。

⁹ 有關川普政府反制中國崛起的經濟措施，本文論述於下一小節之（二）。

因應此一戰略轉變，川普總統宣示將籌建擁有355艘艦艇的海軍政策（Later 2017），而五角大廈亦宣示，為嚇阻中國與俄羅斯的軍事威脅，美國將建立更強大的軍事力量（Garamone 2018）。首先，與歐巴馬政府相似地是，川普政府在東海問題上是採取支持日方的作法—川普與安倍晉三再次確認釣魚台列嶼（日方稱尖閣諸島）是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所涵蓋的範圍；雙方均反對任何片面改變日本管轄該列嶼的權利；美日兩國會在東海加強合作。其次，在南海主權爭議方面，川普政府認為南海是屬國際公海，任何國家的船艦都具有自由航行的權利。美國反對中國在南海的進行填海造陸，並進行軍事化。為反制北京的作為，華盛頓持續執行軍艦「航行自由任務」（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FONOPs），並在此進行軍事演習。2018年5月，美國取消中國參與2018環太平洋軍演；8月，國會在通過的《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當中要求美國國防部長與國務卿共同報告中國在南海勢力擴張的狀況。美方主張中方必須停止繼續人工造島，撤除所有的軍事部署，且連續四年對區域穩定做出貢獻，北京才有機會再次參加環太平洋軍演（李哲全、李俊毅 2018, 28）。

在台灣問題方面，川普政府對台灣極為友善。美國國會於2017年9月通過《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希望美國政府評估美台雙方軍艦是否能進行互訪與停泊。2018年3月，川普總統簽署了《台灣旅行法》，授權美國政府，包括外交、國防及其他各層級官員，允許他們到台灣與對等的台灣官員會晤，而台灣各層級政府官員亦可前往美國，並與對等的美國官員會談。在軍事行動上，美國海軍兩艘驅逐艦馬斯廷號（USS Mustin）與班福特號（USS Benfold）於7月穿越台灣海峽，稍後與雷根號（USS Ronald Reagan）航空母艦戰鬥群在台灣東部會合。針對美艦通過台海，美國國防部亞太助理部長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表示，美國軍艦擁有通過台灣海峽的權利，因為該海峽是屬於國際公海。7月與8月，國會參眾兩院則分別通過《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要求美國國防部長與台灣方面進行軍事防務諮商，並在一年內向國會提交報告。該法案第1257條特別針對「擴大雙方高階軍事交流與聯合軍事訓練」、「支持對台軍售及其他軍備移轉」、與「發展『不對稱作戰能力』」等提出要求；該法案亦要求美國政府必須根據《台灣旅行法》落實美台雙方軍事官員的互訪；

第1258條則建議美台雙方應擴大人道救援與救災，並讓美國醫療船到台灣訪問（李哲全、李俊毅 2018, 27-28）。上述發展顯示了，川普政府極為重視美台雙邊軍事防衛合作的提升。

除了上述對中國所做的若干「制衡或圍堵」作為外，川普與前幾任幾位總統在中國政策（或亞洲政策）有一很大的差異，即是倡議「印太」（Indo-Pacific）戰略。而白宮所認知的印太區域，係指從印度的西岸到美國的西岸（The White House 2017a, 46）。為了因應北京在西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勢力擴張，華盛頓有意與新德里發展更為緊密的夥伴關係，以制衡中國在東南亞與南亞的影響力。川普政府的首任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於2017年10月訪問印度時便提出一個接近「印太聯盟」的概念，意指「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區域」（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其進一步內涵則是要在印度洋與太平洋兩大區域建構並捍衛一個以國際公法為基礎，具有自由航行與普世價值的區域，而不是一個失序，充滿衝突與「掠食掠奪」經濟的地方。¹⁰ 以此戰略架構為基礎，川普政府於2018年5月更進一步將原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改為「印太司令部」（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Command, USIN-DOPACOM），以因應中國在印太兩洋的潛在軍事威脅，及其藉由「一帶一路」倡議而擴大其對東南亞、南亞及東非的政經影響力。準此，川普執政下的美國已逐漸加強其對北京的「制衡或圍堵」，而這也是呼應其原本即希望亞太地區保持自由與開放的立場，不樂見區域秩序是由單一強權所主宰。

整體來說，1993~2018年既有強權美國在面對崛起強權中國時，基本上是採取「交往」政策，輔以「戰略夥伴關係」來強化美中關係。然而，隨著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威脅越發嚴重，華盛頓的對中政策也逐漸轉成「既交往又制衡」，而且「制衡或圍堵」的比重則愈加增高，其可謂是一個典型的「混合策略」（「既交往又制衡」）。然雙方在外交與軍事上的競爭目前仍是「鬥而不

¹⁰ 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區域」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因為中印兩國長久以來的領土糾紛並未解決，二方面是雙方在南亞大陸、印度洋、與中東地區的戰略競爭關係益趨激烈。於是北京的戰略競爭者（華盛頓）與另一個北京的戰略競爭者（新德里）遂「很自然地」結成戰略夥伴，相關資料請參考The White House（2017a, 45-47）。

破」。與1931~1941年美日組合相較，兩個組合的軍事競爭態勢似乎有趨同的跡象，所不同者有二：第一、現今的中國並未如同1931~1941年日本之採取對外戰爭擴張，而是側重內部的整軍經武。然其武力發展已造成既有強權美國與國際社會的諸多質疑。第二、現今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強化部署與1931~1941年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作為極為相似。但對中是採「混和策略」，即在「交往」中逐漸加強「制衡或圍堵」；¹¹ 而對日本是先採「容忍」、「綏靖」，繼而是逐漸加強「制衡或圍堵」（主要是以「凍結」、「禁運」、「終止外交協商」進行，請見圖6）。

二、國際經濟面向

對照1931~1941日本與1993~2018中國的經濟實力（相對於美國），雖然兩者的成長速度都優於所相對應的美國，但很明顯的是，後者的經濟成長幅度與速度是優於前者。相對於日本，中國是自然資源較為豐富的大陸國家，又以非戰爭方式的經濟外交向外開拓其影響力，同時也是美國最重要的國際貿易夥伴。因此，1993~2018美國在經濟方面所面對中國的挑戰，比起1931~1941美國之面對日本的挑戰更為嚴峻。有趣的是，總體經濟條件不如1993~2018中國的1931~1941日本，卻是選擇以「拿」（to take）與戰爭的方式突破其發展困境；而總體經濟條件較佳的中國則是選擇以『給』（to give）與非戰爭的方式展開其國際戰略。¹²

（一）1931~1941：相對經濟弱勢、「拿」的主義、及戰爭策略的日本 vs. 採取經濟制衡的美國

根據本文第三節的分析，不論是經濟成長倍數或速度，1931~1941年日本

¹¹ 在軍事上，雖然美國對中是逐漸地加強制衡與圍堵，但雙方仍建立了若干的軍事交流、互訪、與對話，這些交往機制是有助於雙方避免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請見蔡明彥（2009, 533-566）的研究。

¹² 這一、兩年來，若干接受中國「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投資的開發中國家開始反應，北京所給予的經濟援助並非是真正的經濟援助，反而是類似一種「放高利貸」的經濟掠奪行為，其背後則隱含更多國際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戰略意圖。由於中國的「給」並非符合其本意與精神，加以此一現象與問題正處於新興發展階段，因此本文有關『給』式主義遂用雙引號。相關論述則在此一小節之（二）的第三段落中呈現。

圖6 既有強權美國對崛起強權日本（1931~1941）與崛起強權中國（1993~2018）之政策選擇的比較：外交與軍事

日本	作為	佔領中國東北（1931） 擴軍（1920s, 1930s）	中日戰爭（1937.7）、大東亞共榮圈（1940.8） 入侵中南半島（1940.9）、廢除美日通商航海條約（1940.1） 德義日三國同盟（1940.9）、日蘇中立條約（1941.4）
美國	作為	擴軍、中立法案	官方船隻不運送物資給中日兩國（1937.9） 譴責日本行為（1937.10）、凍結日本在美資產（1940~） 禁運戰略物資輸往日本（1940~）、終止與日本的外交談判 對中國提供軍事援助（1940~）、加強美軍在太平洋的部署（1940~） 廢除美日通商航海條約（1939.7）、租借法案（1940~41）
	政策選擇	中立、容忍、綏靖	外交談判
	時間軸線	1931~1937 1993~2001（柯林頓）	從綏靖到制衡或圍堵 1937~1940 2001~2009（小布希）
美國	政策選擇	交往、戰略夥伴關係	交往、戰略夥伴關係
	作為	Clinton訪中及「三不政策」 （1998.6） 美誤炸中駐貝爾格勒大使館 （1999.5）	美中軍機擦撞（2001.4） 911恐怖攻擊（2001.9） 「負責任的大國」（2005.9）
中國	作為	銀河號事件（1993.7） 台海危機（1995.7, 1996.3） 江澤民訪美（1997.11）	韜光養晦、和平崛起、和平發展 六方會談（2006.10）

日本	作為	預防性戰爭 (1941.12)
美國	作為	加強美軍在太平洋的部署 租借法案 (1940-41) 對日宣戰 外交談判
	政策選擇	從制衡或圍堵到戰爭
時間軸線		
		1940~1941
		2009~2017 (歐巴馬)
美國	政策選擇	混合策略：交往、戰略夥伴關係+制衡或圍堵 「調適或適應」、「戰略再保證」
	作為	G2與戰略與經濟對話 (2012.5) 重返亞洲與亞太再平衡 (2009.7)
中國	作為	2017~2018 (川普) 混合策略：交往 (未著墨)、戰略夥伴關係 (未著墨) + 制衡或圍堵 (增加) 重申強化美日安保、對台一系列友善立法與行動 持續巡弋南海，反對中方填海造陸與軍事化 推出印太戰略 在南海填海造陸與軍事化

說明：1937~1940及1940~1941年之間，美日雙方並未停止透過外交談判方式以解決雙方逐漸惡化的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是較優於當時的美國；但是與1993~2018年中國相比（中國一樣優於同期的美國），則日本是較劣於中國（請見表1）。然而，對於沒有豐厚天然資源的海洋國家，又是高度依賴著外國貿易進口（主要是美國），東京的政策選擇或可採取「扈從」於華盛頓，但其卻是採取「對抗」，並侵犯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全面佔據中國，違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入侵菲律賓與東南亞，掠奪美國的屬地與損及美國利益。

首先，1931~1941年日本自身也是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受害者（雖然它所受到的衝擊不若歐美等大國），爲了挽救所受波及的國內經濟，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並扶持建立滿州國。接著發動全面性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希冀佔領全中國，最後進軍東南亞，圖取整個西太平洋。1938年11月，日本號召建立「大東亞新秩序」（New Order in East Asia），希望藉此樹立由日本、滿州國、與中國三國所共同領導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共同體（Roy 2009, 33-36）。1940年8月，日本進一步號召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一樣是以日本、滿州國、與中國（南京汪精衛政府）做爲經濟共同體，並以廣大的東南亞做爲上述地區的資源供應地。¹³ 從歷史經驗來看，1931~1941年日本所追求的「大東亞新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其實是流於政治性的國際宣傳口號，距當代「區域整合」或「經濟共同體」的概念與實踐仍十分遙遠，更沒有現今國際貨幣基金的財政紓困貸款措施，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之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援助，以及區域性世界銀行之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的對亞洲開發中國家經濟援助。相反地，日本是從各佔領區獲取物資以支助其國內的經濟發展，和對外的侵略戰爭。就此而言，1931~1941年日本採行的是一種「拿」式主義的國際經濟行爲（掠奪與殖民），與現今中國『給』式主義的經濟援助外交、區域經濟整合、以及「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總體經濟戰略等大相逕庭。

對於崛起強權日本的「拿」式主義行爲，可能的解釋爲：其一、此時期的

¹³ 大東亞共榮圈的範圍包括：日本（含南京汪精衛政權中國、滿州國、台灣與朝鮮）、重慶蔣介石政權中國、法屬中南半島、荷屬東印度、英屬印度、英屬馬來亞（包括新加坡）、英屬香港、英屬婆羅洲地區（包括砂撈越與汶萊）、新幾內亞、澳洲、紐西蘭等大洋洲地區與蘇聯西伯利亞東部。

日本經濟雖快速成長，但卻是用於國內的工業生產與建軍擴軍，而非是向外國提供經濟援助。其二、日本各佔領區的物資與人力是要支應日本國內的生產製造，而不是提供做為當地的建設與發展。其三、國際經濟援助、國際發展建制、與區域經濟整合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被倡議的，戰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並未見這些思潮，此時大國的國際視野主要還是帝國主義式的殖民地思維。由於與中國進行全面戰爭破壞了美國的對中「門戶開放」原則，而入侵東南亞則又嚴重侵害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經濟利益，並進一步危及美國的安全，因此華盛頓的政策選擇也就從原來的「中立」、「綏靖」轉為「制衡或圍堵」（採取凍結與禁運的方式），再到最後的「戰爭」。

（二）1993~2018：相對經濟強勢、『給』式主義、及非戰爭策略的中國 vs. 採取經濟交往的美國

相對地，1993~2018年中國的經濟成長倍數與速度，是優於同時期的美國，也優於1931~1941年日本。而經濟條件相對良好的中國（相較於日本）則是採取『給』式主義的國際經濟行為（投資、貿易與經濟整合），以開拓其區域性與全球性的影響力。為此，北京一方面營造它和平與和諧的對外關係；另一方面是建立中國國際政治與經濟的領導地位；三方面則是回饋與幫助中國內部的經濟成長以形成良性循環。

事實上，中國採取『給』式主義的經濟外交由來已久，而「對外援助」（foreign aid）則是最主要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給』式主義的國際經濟行為在2013年出現一個重大變化。是年9月，北京提出跨國經濟帶的總體國際經濟戰略，稱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為「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r One Belt One Road, OBOR）（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根據BBC中文網（2015a）中的「香港觀察：『一帶一路』給香港帶來的發展機遇」一文指出，目前有包含有亞洲在內26個國家和地區，總人口數約44億，總經濟產量約21萬億美元。就基礎設施建設部分，包括：鐵路、公路、港口、機場、橋樑、輸油管線、供電網路、以及光纖纜線等等，這些投資與建設將為歐亞大陸與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此外，沿著「一帶一路」的經濟戰略構想，同年10月，北京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為「亞投

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根據新華網2014年10月24日的報導「21國在京簽約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指出(新華網2014)，其目的即在為先前提出的「一帶一路」計畫籌措建設基金，並促進亞歐之間的相互通聯與經濟整合。依「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網站」資料所提出的規劃構想，總部將設在北京，法定資本額為1000億美元，中國宣稱將出資500億美元。截至2018年8月為止，亞投行的成員國家共有80個(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2018)。準此，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逐漸成為「崛起經濟強權」(相對地，美國則為「既有經濟霸權」)。藉由此兩項國際經濟戰略構想的提出，北京企圖主導未來歐亞大陸的經濟發展。而亞投行的創建則有另外一個戰略構想—取代由全球既有經濟霸權美國所主導的世界銀行，以及由另一個亞洲經濟強權日本所領導的亞洲開發銀行。這些都顯示，中國以經濟外交的方式，採取『給』的策略，以發揮它在國際政治與經濟上的影響力，這與1931~1941年日本所採取的戰略極為不同。

雖然如此，近年來有關開發中國家對「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反應，卻也透露出中國『給』式主義經濟外交另一值得深思的面貌。事實上，若干接受「一帶一路」援助的開發中國家與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便發現，北京藉此所給的經濟援助並非真正的經濟援助，反而是類似一種「放高利貸」的經濟掠奪行為，其背後則隱含更多國際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戰略意圖。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就曾引述國際貨幣基金總裁Christine Lagarde所提出的警告說，「一帶一路」計畫大量採取缺乏透明程度的貸款合約，並且規定必須由中國企業負責計畫進行，如此造成許多開發中國家債台高築，甚至是債務危機，該國家的財政將嚴重地被北京所控制(Clover 2018)。另外，若是開發中國家無法償還巨額債款，於是將其國內部分重要的基礎設施「租借」給中國使用，而且租約的年限很長，這將變相式地造成由中國「佔據並使用」。倘若北京又據此而將其建蓋為軍事基地，則中國可以藉此模式而投射其政治、經濟、與軍事影響力。2017年12月，斯里蘭卡因無法償還向中國所借的10億美元貸款，於是被迫將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租借給中國，借期為99年。2018年8月，新任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訪問中國時，宣佈取消了兩份前任政府與中國所簽訂的基礎設施計畫協議。馬哈迪認為，該協議會造

成馬國嚴重的負債，並且讓中國得以控制馬國的政治與經濟。根據美國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於2018年3月所發表的報告指出，全球目前已有23個國家陷入極高的債務風險當中，其中更有8個國家未來可能無法償還債務，而中國正是他們最主要的債權人（Morris 2018）。準此，若以上屬實，則北京的『給』式主義經濟外交非但不符合其本意與精神，同時也合理化了華盛頓對其「掠奪者」（predator）的指控。若是如此，則1993~2018年經濟崛起的中國與1931~1941年經濟崛起的日本在策略的本質上是極為相似的，所不同的是前者以非戰爭的方式進行掠奪，後者則是以戰爭的方式進行掠奪。

面對中國經濟快速的發展，柯林頓與小布希政府皆是採取「交往」政策，也就是鼓勵美中雙方與對方進行投資與貿易。然而在歐巴馬時代，美國在經濟上是採取一種「混合策略」—即雙方的投資與貿易「交往」仍持續進行，但是面對中國近年來所倡議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等經濟戰略，華盛頓認為崛起經濟強權中國已開始挑戰既有經濟霸權美國的領導地位，尤其是由美國所主導建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以亞投行為例，美國起初是採取近似「規避」、「杯葛」、或「制衡」的政策選擇，目的就是讓該倡議進行不順利，並削弱其發展的力道。而BBC中文網在2015年3月15日的報導也指出，除了美國自己不參加亞投行以外，華盛頓亦遊說其盟邦不要加入（BBC中文網 2015b）。但是隨著許多國家加入，以及美國的同盟國家加入（包括英國、德國、法國、澳大利亞等），華盛頓的態度開始出現轉變—轉而表示盟國可以自行決定加入與否，但美國仍期盼亞投行的運作過程能增加透明度，同時也具備更好的治理能力。很顯然地，美國態度的變化正說明其「規避」、「杯葛」或「制衡」亞投行的作為亦出現了鬆動。就中國來說，美國依然是以近似「杯葛」、「制衡」的方式面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力；而美國的許多盟邦則是採取與中國「交往」。另外，從美國盟邦的角度來看，美國似乎是選擇「中立」，因為美國沒有特定的立場，其同盟國可選擇參加或不參加。以傳統軍事同盟的概念而言，當美國與其盟邦共同面臨潛在的威脅時（經濟崛起中國所帶來的衝擊），他們的立場應該一致（即一致採取規避、杯葛或制衡，或一致採取加入）。然而，是否參與亞投行問題卻反映了美國與其盟邦之間的看法分歧—華盛頓認為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會是「威脅」，而

其他盟邦則認為是「機會」。準此，對既有經濟霸權美國及其所領導的同盟而言，他們之間的分歧可能是一種「警訊」；而對中國來說，美國與其盟邦之間的歧見則是一種「機會」。

然而，在川普總統上任後，美國對中國所倡議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並未進行杯葛或抵制。2017年5月，川普政府甚至派團出席在北京所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會。然而，華盛頓對國際自由貿易與全球化的態度卻出現了強烈的轉變—美國先是退出由其所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再者是對許多它的貿易夥伴（特別是中國）發起相互抬高關稅的貿易戰爭。事實上，這兩者是高度相關的。川普政府認為，美國唯有修正原先其對國際自由貿易的態度，美國才能繼續保持其在國際社會的領導地位；對中國不公平的貿易進行反制，美國經濟與國力才能避免被中國進一步地侵蝕。華盛頓認為，北京不只是從國際貿易（特別是對美貿易）中獲得巨大的順差，其本身更是有計畫性地對美國的高科技產業進行研發與技術上的竊取，有計畫性地侵蝕與掠奪美國的經濟、市場、產業與全球領導地位（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8, 51-53; 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2018, 2）。為此，美國遂展開了若干的措施。例如2017年9月，白宮網站透露川普政府以涉及軍事應用與國家安全為理由，否決了一家來自中國的「中國創業投資基金有限公司」（China Venture Capital Fund Corporation Limited）對美國晶片製造商的併購案（The White House 2017b）。路透社在2018年7月14日報導則指出，在4月份美國就已經對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ZTE）進行制裁，因為美國商務部調查發現，中興通訊並未真正落實處理其違反美國出口禁令的缺失（Freifeld 2018）。

另外，從2018年3月開始，美國與中國展開一系列的貿易戰爭。3月23日，華盛頓進行第一波貿易制裁，對中國的鋼、鋁分別課徵25%和10%的關稅，其總值約500億美元；4月3日，中國則宣布對美國的128項進口產品（約30億美元）加徵15%或25%關稅以做為反制。7月6日，美國發動第二波貿易制裁，針對中國約340億美元的818項商品加徵25%關稅；中國則宣布對美國340億美元的545項商品加徵25%關稅。8月7日，美國再進行第三波的貿易制裁，針對中國約160億美元的279項商品加徵25%關稅；8月23日，中國則開始對約

16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課徵25%關稅。然而於此同時，美中雙方仍在5月、6月與8月進行了四次談判（李哲全、李俊毅 2018, 26-27）。雖然美中雙方貿易戰爭是「打打談談」，而且輸贏未定，但美國很顯然是以此方式，「預防性」（preventive）地反制中國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以及中國對美國智慧財產與高科技的侵害掠奪。除了既有的貿易失衡問題外，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2018年的《中國的經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與全球的科技與智慧財產》與《向國會提交有關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等年度報告書皆指出，北京是持續地以經濟手段，輔以創新科技發展以及「一帶一路」總體經濟戰略等方式，全面地向國際社會擴張其影響力，並試圖取代由美國所建立的全球政經秩序。對此，川普政府則是在仍握有若干優勢下發動對中貿易戰爭，其目的即在防範兩國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當中。

整體來說，當美國面對1931~1941年日本時，其經濟上所採取的政策是「制衡或圍堵」，主要是逐漸縮減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往來。而隨著局勢的惡化，華盛頓則加大對東京的「凍結」與「禁運」。相對地，當美國面對1993~2018年中國時，柯林頓與小布希皆是採取「交往」政策，鼓勵美中雙方與對方進行投資與貿易。但是在歐巴馬執政的時候，美中雙方雖然仍持續經濟上的交往，但是面對北京的人民幣升值、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等問題時，華盛頓則是採取「規避」、「杯葛」或「制衡」的作為。而在川普執政的時候，美國雖無杯葛、制衡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但卻發動了以提高關稅的方式來進行美中之間的貿易戰爭。準此，川普執政下的美國對中國的反制與先前美國對日本的反制極為相似一皆是以經濟作為手段。所不同的是前者以「提高關稅」的貿易戰為主，後者則以「凍結」與「禁運」的經濟戰為主；前者最終是否會導致軍事衝突或戰爭仍不得而知，後者最後則是導致戰爭（請見圖7）。

伍、結論

當今的既有強權美國確實面臨到崛起強權中國的挑戰，而在1931~1941年之間，當時的既有強權美國也的確面臨了崛起強權日本的衝擊。然而因為中日雙方所處的環境不同，向外採取的策略不同，美國亦採取了不同的政策選擇以

圖7 既有強權美國對崛起強權日本（1931~1941）與崛起強權中國（1993~2018）之政策選擇的比較：國際經濟

日本	作為： 「拿」式主義	佔領中國東北（1931） 建軍擴軍（1920s, 1930s）	中日戰爭（1937.7） 大東亞新秩序（1938.11）、大東亞共融圈（1940.8） 入侵中南半島（1940.9）、廢除美日通商航海條約（1940.1）
美國	作為	擴軍 中立法案	官方船隻不運送物資給中日兩國（1937.9） 凍結日本在美資產（1940~）、禁運戰略物資輸往日本（1940~） 廢除美日通商航海條約（1939.7）
	政策選擇	中立、容忍、綏靖	從綏靖到制衡或圍堵（凍結、禁運）
中國	時間軸線	1931~1937 1993~2001（柯林頓）	1937~1940 2001~2009（小布希）
	政策選擇	交往	交往
	作為	貿易、投資	貿易、投資
中國	作為： 『給』式主義	貿易、投資	貿易、投資

日本	作爲「拿」式主義	預防性戰爭 (1941.12)
美國	作爲	凍結日本在美資產 (1940~) 禁運戰略物資輸往日本 (1940~) 廢除美日通商航海條約 (1939.7~)
	政策選擇	從制衡或圍堵 (凍結、禁運) 到戰爭
時間軸線		
1940~1941		
美國	政策選擇	2009~2017 (歐巴馬) 混合策略：交往 +規避、杯葛、制衡或圍堵 (對一帶一路及亞投行)
	作爲	2017~2018 (川普) 混合策略：交往 +制衡或圍堵 (提高關稅) 戰爭 (經濟、貿易)
中國	作爲	美國不參加，遊說盟邦也不要參加 →盟邦自行決定要不要參加 →增加透明度與更好治理能力
	作爲「給」式主義	提高關稅之貿易戰 持續一帶一路 (2013.9~) 持續亞投行 (2013.10~)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為回應。

在上述的比較當中，1931~1941年日本在外交軍事及國際經濟上是採取激進的策略，如此引來美國的反制，最後造成美日太平洋戰爭。整體而言，1931~1941年日本在外交軍事以及國際經濟兩方面的策略不若1993~2018年中國的相對彈性與靈活。但是，雖然相較於1931~1941年日本的激進，1993~2018年中國是顯得相對的溫和，但是北京在內政、外交軍事、以及對外經濟上仍相當程度地展現其強勢的企圖與作為，包括：新一代領導人迅速地鞏固其政權並強勢領導內政，國際外交上展現其大國向外積極的開拓與經營，維持穩定且快速的軍事現代化，並且藉由經濟成長而促成北京在政治外交與國際經濟上的正向共伴效應。更重要的是，北京並未發動向外侵略戰爭，反而是以「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等論述向國際社會進行宣傳，此為與1931~1941年日本之最大的不同。

從美國回應「日本崛起」（1931~1941）與「中國崛起」（1993~2018）的比較看來，美國對日本是先行中立、綏靖，但也繼續保持外交接觸（談判）。隨後轉為採取物資禁運、資產凍結的「制衡或圍堵」措施，但也仍繼續保持外交斡旋。最終，外交談判失敗，日方先行軍事攻擊美國，美方宣戰，繼而雙方走向戰爭。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是延續著1972年以來的交往政策，並加進戰略夥伴關係。但隨著中國崛起的威脅加劇，制衡或圍堵遂被更加地強調，因此實為混和策略。又雖然美中雙方不斷地進行「制衡或圍堵」與「反制衡或圍堵」，但兩者皆是鬥而不破，因此美中兩國目前並未發生戰爭。

綜合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幾點結論：第一、倘若時光可以倒流，1931~1941年日本當以1993~2018年中國為師，而採取相對彈性、多元、與溫和的崛起方式，而美國亦仿效其今日的對中政策選擇（混和策略），則美日雙方或能避免戰爭。第二、訪古思今，以1931~1941年日本（美日關係）為訓，若1993~2018年中國能避免1931~1941年日本之採取激進的向外軍事擴張，而確實落實其「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加以美國能多去除「制衡或圍堵」的元素，並加大「交往」的成分，則中美雙方應該能避免走向戰爭。反之，則可能複製1931~1941年日本與美日關係。第三、當今的美國必須思索，若其在對中政策上採取更多的「制衡或圍堵」的元素，例如：杯葛、封鎖、制裁、禁

運、或凍結等，則其是否會迫使北京複製1931~1941年日本之激進作為，最後落入所謂「大國政治的悲劇」或「修昔底德陷阱」？此當為歷史經驗給予大國外交之政策選擇的重要思考視野。

（收件：107年3月26日，接受：107年11月9日）

An Analysis of Dominant Powers' Policy Options toward Rising Powers: Examples of the U.S. Reactions to the Rise of Japan and China

Liang-chih Evans Che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nd Acting Director
Division of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and Policy,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INDSR)

Chao-lung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 and Civic Educ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cases - *the US dominant power vs. the Japan rising power (1931-1941)* and *the US dominant power vs. the China rising power (1993-2018)* can provide ample constructive thinking on the contemporary US-China rela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a dominant power reacts to a rising power.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dominant powers' policy options toward rising powers, based on Randall Schweller's theories, is developed and applied to this study. This paper has found that facing a rising Japan from 1931 to 1941, the US first opted for neutrality and appeasement, but later changed to balancing,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war. In contrast, facing a rising China from 1993 to 2018, the US opted for engagement in principle and supplemented it with strategic partnership. However, in the case of rising China, due to the return of the US to Asia, the US gradually shifted

its policy to engagement while balancing - this type of shift is a typical mixed strategy. As such, two different kind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great powers have resulted in different consequences.

Keywords: U.S.-Japan Relations, U.S.-China Relations, Balancing, Engagement

參考文獻

- BBC中文網，2015a，〈香港觀察：「一帶一路」給香港帶來的發展機遇〉，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hong_kong_review/2015/04/150421_hkreview_business，查閱時間：2018/01/01。BBC Chinese. 2015. “Xiang gang guan cha ; ‘yi dai yi lu’gei xiang gang dai lai de fa zhan ji yu” [Hong Kong Watch: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One Belt, One Road’to Hong Kong]. (Accessed on January 1, 2018).
- BBC中文網，2015b，〈透視中國：美國要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嗎？〉，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_watch/2015/03/150325_china_watch_aiiib_us，查閱時間：2018/01/01。BBC Chinese. 2015. “Tou shi zhong guo: mei guo yao jia ru zhong guo zhu dao de ya tou hang ma ?”[Insights into China: Does the United States Want to Join the Chinese-led AIIB?]. (Accessed on January 1, 2018).
- 中國新聞網，2015，〈王毅：交流與合作仍是中美關係主流〉，<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6-27/7370082.shtml>，查閱時間：2018/01/01。Chinanews.com. 2015. “Wang yi: jiao liu yu he zuo reng shi zhong mei guan xi zhu liu”[Wang Yi: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re Still the Mainstream of Sino-US Relations]. (Accessed on January 1, 2018).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3，〈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奧巴馬開始舉行中美元首會晤〉，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3nzt_675233/xjpdwfw_675267/zxxx_675269/t1048747.shtml，查閱時間：2018/08/28。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Zhong hua ren min gong he guo wai jiao bu, xi jin ping tong meiguozong tong aoba ma kai shi ju hang zhong mei yuan shou hui wu”[Xi Jinping and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Begin to Hold a Meeting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Leaders]. (Accessed on August 28, 2018).
- 李哲全、李俊毅主編，2018，《2018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台北：

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Li, Zhe quan, and Jun yi Li ed. 2018. *2018 Yin tai qu yu an quan qing shi ping gu bao gao [2018 Indo-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Assessment Report]*. Taip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INDSR) Publishing.

吳玉山，2011，〈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389-415，台北：五南。Wu, Yu-shan. 2011. "Quan li zhuan yi li lun : bei ju yu yan"[Power Transfer Theory: Tragedy Prediction?]. In Zon-ghe Bao, ed., "*Guo ji guan xi li lu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389-415. Taipei: Wu Nan Publishing.

周保雄譯，吉田裕著，2016，〈亞洲、太平洋戰爭〉，香港：香港中和。Zhou, Bao-xiong trans., Yutaka Yoshida. 2016. *Ya zhou 、tai ping yang zhan zheng [Asia, Pacific War]*. Hong Kong: Xiang Gang Zhong He Publishing.

馬文博譯，崛田江理著，2015，〈日本1941〉，香港：商務。Ma, Wen-bo trans., Eri Hotta. 2015. *Ri ben 1941 [Japan 1941]*.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陳亮智，2014，〈美「中」戰略夥伴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從「戰略夥伴關係」、「新型大國關係」到「軍事同盟關係」〉，〈戰略與評估〉，5(1)：1~18。Chen, Liang-Chih Evans. 2014. "Mei zhong zhan lue huo ban guan xi de hui gu yu zhan wang: cong zhan lue huo ban guan xi 、xin xing da guo guan xi dao jun shi tong meng guan xi"[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US '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From 'Strategic Partnership',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 to 'Military Alliance Relations']]. *Strategy and Assessment*, 5(1): 1-18.

黃美蓉譯，加藤陽子著，2017，〈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新北：廣場。Huang, Mei-rong trans., Yoko Kato. 2017. *Ri ben ren wei he xuan ze le zhan zheng [Why Did the Japanese Choose War?]*. New Taipei City: Square Publishing.

新華網，2014，〈21國在京簽約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0/24/c_1112965880.htm，查閱時間：

2018/01/01。Xinhua Net. 2014. “21 guo zai jing qian yue jue ding cheng li ya zhou ji chu she shi tou zi yin hang” [21 Countries Signed a Contract in Beijing to Decide to Establish an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ccessed on January 1, 2018).

蔡明彥，2009，〈美國與中國軍事交流之發展與限制（2004~2007年）〉，
《歐美研究》，39(3)：533-566。Tasi, Ming-yan. 2009. “Mei guo yu zhong guo jun shi jiao liu zhi fa zhan yu xian zhi (2004~2007 nian)” [The Development and Restrictions of Military Exchan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39 (3): 533-566.

蔡東杰，2011，《當代中國外交政策》，台北：五南。Tasi, Dong-jie. 2011. *Dang dai zhong guo wai jiao zheng 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aipei: Wu Nan Publishing.

蔡曉卉譯，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著，2015，《中美新型戰略關係：走向戰爭還是走向合作？》，台北：大雁出版基地。Cai, Xiaohui trans.,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 2015. *Zhong mei xin xing zhan lue guan xi: zou xiang zhan zheng hai shi zou xiang he zuo?*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aipei: Dayan Publishing Base.

Allison, Graham.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2018. “AIIB Approves Membership of Argentina, Madagascar and Tonga: The Bank approved membership rises to 80.”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7/20170616_003.html (January 1, 2018).

Beckley, Michael. 2011.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3): 41-78.

Bernstein, Richard, and Ross H. Murnro. 1997.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76 (2): 18-32.

Brooks, Stephen G., G. 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12.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3): 7-51.

- Calmes, Jackie. 2011. “Obama’s Trip Emphasizes Role of Pacific Rim.” http://www.nytimes.com/2011/11/19/world/asia/obamas-trip-sends-message-to-asian-leaders.html?_r=0 (January 1, 2018).
- Christensen, Thomas J. 1999.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4): 52-57.
- Christensen, Thomas J. 2015.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 Clinton, Hilary. 2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189: 56-63.
- Clover, Charles. 2018. “IMF’s Lagarde Warns China on Belt and Road Debt.” <https://www.ft.com/content/8e6d98e2-3ded-11e8-b7e0-52972418fec4> (August 29, 2018).
- Doran, Charles. 1991. *Systems in Crisis: New Imperatives of High Politics at Century’s E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 Feng, Huiyun. 2009. “Is China a Revisionist Powe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 (3): 313-334.
- Friedberg, Aaron L. 2011.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NY: W.W. Norton & Co.
- Friedberg, Aaron L. 2015. “The Debate Over US China Strategy.” *Survival*, 57(3): 89-110.
- Freifeld, Karen. 2018. “U.S. Lifts Ban on Suppliers Selling to China’s ZTE.”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zte/u-s-lifts-ban-on-suppliers-selling-to-chinas-zte-idUSKBN1K32CN> (August 29, 2018).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laser, Charles L. 2015. “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 (4): 49-90.

- Garamone, Jim. 2018. "DoD Official: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Will Enhance Deterrence." <https://www.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419045/dod-official-national-defense-strategy-will-enhance-deterrence/> (January 1, 2018).
- Gholz, Eugene, Daryl G. Press, and Harvey M. Sapolsky. 1997. "Come Home, America: The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4): 5-48.
- Green, Michael. 2017.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urtov, Melvin. 2006. *Superpower on Crusade: The Bush Doctrine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Ikenberry, G. John.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87 (1): 23-37.
- Ikenberry, G. John. 2014. "From Hegemony to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23 (2): 41-63.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8. "IMF DataMapper." <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PPGDP@WEO/OEMDC/ADVEC/WEOWORLD/USA/CHN> (January 1, 2018).
- Iriyw, Akira. 1987.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NY: Longman.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03.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4): 5-56.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13.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4): 7-48.
- Kang, David. 2007.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y, Sean. 2000. "What I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Problem of Post-Communism*, 47 (3): 15-24.

-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 Kissinger, Henry A. 2011. *On China*. New York, NY: Penguin Press.
- Kugler, Jacek, and A. F. K. Organski. 1989.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anus I. Midlarsky, ed., *Handbooks of War Studies*, pp. 171-194. Boston, MA: Unwin Hyman.
- Later, David. 2017. "Trump Just Made a 355-ship Navy National Policy." <https://www.defensenews.com/congress/2017/12/14/trump-just-made-355-ships-national-policy/> (January 1, 2018).
- Layne, Christopher. 1993.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4): 5-51.
- Layne, Christopher. 2006a.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yne, Christopher. 2006b. "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 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 (2): 7-41.
- Lemke, Douglas. 2004. "Great Power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A Power Transition Perspective." In T.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pp. 52-7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berthal, Kenneth. 2011.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 Why President Obama's Turn to the East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2/21/the-american-pivot-to-asia/>(January 1, 2018).
- MacDonald, Paul K., and Joseph M. Parent. 2011. "Graceful Decline? 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5 (4): 7-44.
- Mastanduno, Michael. 2002. "Incomplete Hegemony and Security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p. 181-21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earsheimer, John J. 2014.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http://nationalinterest.com>

- org/commentary/can-china-rise-peacefully-10204 (January 1, 2018).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 "China-US Relations in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wjb_663304/zzjg_663340/bmdyzs_664814/xwlb_664816/t953682.shtml (January 1, 2018).
- Modelski, George. 1987.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Monteiro, Nuno P. 2011. "Unrest Assured: Why Unipolarity Is Not Peacefu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3): 9-40.
- Morris, Scott. 2018. "Researchers Urge China to Improve Their Debt Practices and Adopt Standards." <https://www.cgdev.org/article/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heightens-debt-risks-eight-countries-points-need-better> (August 29, 2018).
- Nadkarni, Vidya. 2010.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 Asia: Balancing without Alliances*. London, UK: Routledge.
-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8.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8*. Washington, D.C.: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 O'Neil, Willam D. 2003a.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s a Competitive Systemic Process: The Case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 Alexandria, VA: US Defense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
- O'Neil, Willam D. 2003b. *Interwar U.S. and Japanese National Product and Defense Expenditure*. Alexandria, VA: US Defense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
- Paul, T. V. 2005.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1): 46-71.
- Paul, T. V. 2016. "The Accommodation of Rising Powers in World Politics." In T.V. Paul, ed., *Accommodating Rising Power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16-1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lante, Trevor K. 2003. "'Two Japans' : Japanese Expressions of Sympathy and Regret in the Wake of the Panay Incident." In Walter L. Hixson, ed., *The*

- United States and the Road to War in the Pacific*, pp. 101-111. New York, NY: Routledge.
- Rasler, Karen A., and William R. Thompson. 1994. *The Great Powers and Global Struggle, 1490-1990*.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 Ratner, Ely. 2013. "Rebalancing to Asia with an Insecure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6 (2): 21-38.
- Rock, Stephen R. 2000. *Appeaseme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 Ross, Robert S. 1999. "Engagement in U.S. China Polic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ent Power*, pp. 176-206. New York, NY: Routledge.
- Ross, Robert S. 2006.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15 (3): 355-395.
- Roy, Denny. 1994. "Hegemony on the Horiz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 149-168.
- Roy, Denny. 2009. *The Pacific War and Its Political Legacies*. London, UK: Praeger.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 72-107.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9.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pp. 1-31.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chweller, Randall L., and Xiaoyu Pu. 2011.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1): 41-72.
- Shambaugh, David. 1996.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Calculating Beijing's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2): 180-209.
- Shirk, Susan L. 2007.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inberg, James. 2009.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https://china.usc.edu/james-steinberg-obama-administrations-vision-us-china-relationship-september-24-2009> (September 3, 2018).
- Steinberg, James, and Michael E. O'Hanlon. 2014.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8.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milex_database (January 1, 2018).
- Sun, Youli. 1993.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1-1941*.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 Taliaferro, Jeffery W. 2016. "Di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lies Fail to Accommodate Japan in the 1920s and the 1930s?" In T.V. Paul, ed., *Accommodating Rising Power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173-197.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mmen, Ronald L.,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id, and A. F. K. Organski. 2000.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NY: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Seven Bridges Press.
- Tellis, Ashley J. 2013. "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 A U.S. Strategy for Confronting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6 (4): 109-124.
-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7. "China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07/06/11/china-as-responsible-stakeholder-event-998> (January 1, 2018).
-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2005.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https://www.ncusc.org/sites/default/files/migration/Zoellick_remarks_notes06_winter_spring.pdf (January 1, 2018).
-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Full text: Action plan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ttp://english.gov.cn/archive/publica->

tions/2015/03/30/content_281475080249035.htm (January 1, 2018).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3.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usan E. Rice."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11/21/remarks-prepared-delivery-national-security-advisor-susan-e-rice> (January 1, 2018).

The White House. 2017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The White House. 2017b. "Order Regarding the Proposed Acquisition of Lattice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by China Venture Capital Fund Corporation Limited."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order-regarding-proposed-acquisition-lattice-semiconductor-corporation-china-venture-capital-fund-corporation-limited/> (August 29, 201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0. "Remark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9/146917.htm> (January 1, 201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2018. "Milestones: 1937-1945: Japa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1937-41."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37-1945/pearl-harbor> (January 1, 2018).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1): 5-41.

Want China Times. 2015. "Top Goal of Xi's US Visit: Consensus on New Major Power Relations." <http://wantchinatimes.com/news/content?id=20150917000055&cid=1101> (January 1, 2018).

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2018. *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White, Hugh. 2012. *The China Choice: 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ttkopf, Eugene R., Christopher M. Jones, and Charles W. Kegley, Jr. 2003.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 Wright, Thomas. 2015. "China and Russia vs. America: Great-Power Revisionism Is Back."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russia-vs-america-great-power-revisionism-back-12733> (January 1, 2018).
- Yang, Jiemian. 1999. "Summit Diplomacy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Aspirations, Expectations, and Realization." In Peter Koehn and Joseph Y.S. Cheng, eds., *The Outlook for U.S.-China Relations Following the 1997-1998 Summits*, pp. 49-66.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Zhao, Suisheng. 2016. "China as a Rising Power Versus the US-led World Order."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1 (1): 13-21.